

陕北宋金石窟佛教图像的类型与组合分析

Types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Song and Jurchen Jin Dynasties Buddhist Murals in North Shaanxi's Grottos

李静杰

Li Jingjie

内容提要：

陕西北部北宋、金代石窟分布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高原，涉及至少13个市、县的近50个地点，北宋晚期至金代早期为基本发展期。石窟结构以各种类型佛坛窟为主体，大、中、小规格俱全。石窟图像绝大多数来源于唐、五代时期，可以分为主流、非主流两大类。图像组合以“三佛”（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为主尊者居多，周围配置文殊与普贤菩萨、十六罗汉、涅槃与五百罗汉、水月观自在菩萨、千佛、万菩萨中的一种或几种图像，这些主流图像连同其他非主流图像共同构成石窟图像。各种不同功能的图像，采用叠加方式组织在同一石窟之中，同时表述多种佛教思想，形成显著区域和时代特征。所反映的往生净土、传承佛法、菩萨行、倡导孝行、现世救济思想，构成陕北宋金石窟的实质内涵。

关键词：

陕北宋金石窟 佛教图像的类型与组合

ABSTRACT:

Stone grottos datable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 and the Jurchen Jin dynasty (1115-1234) are distributed in nearly 50 sites of at least 13 towns and counties on the plateau in north Shaanxi province centering on the city of Yan'an. Buddhist grottos of different types and sizes comprise the majority of the cave cluster. The murals are primarily datable to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nd the Five Dynasties (907-960), and can be classified as mainstream and non-mainstream. Mos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otagonists in the murals is that of Shakyamuni, Maitreya, and Amitabha, usually complemented by images of Manjusri, Samantabhadra, the sixteen Arhats, Nirvana and the five hundred Arhats, Avalokitesvara, the Thousand Buddhas, and the Ten-thousand bodhisattvas, or any combination of them. These mainstream images with other non-mainstream images constitute the mural images of the grottos. Different image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are displayed in a single cave to convey different Buddhist thoughts, showing distinguished regional or period characteristics. Themes such as the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the dissemination and carrying-on of Buddhist doctrine, the bodhisattva practice, the virtue of filial piety, and this-life relief constitute the actual content of the Buddhist grotto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Jurchen Jin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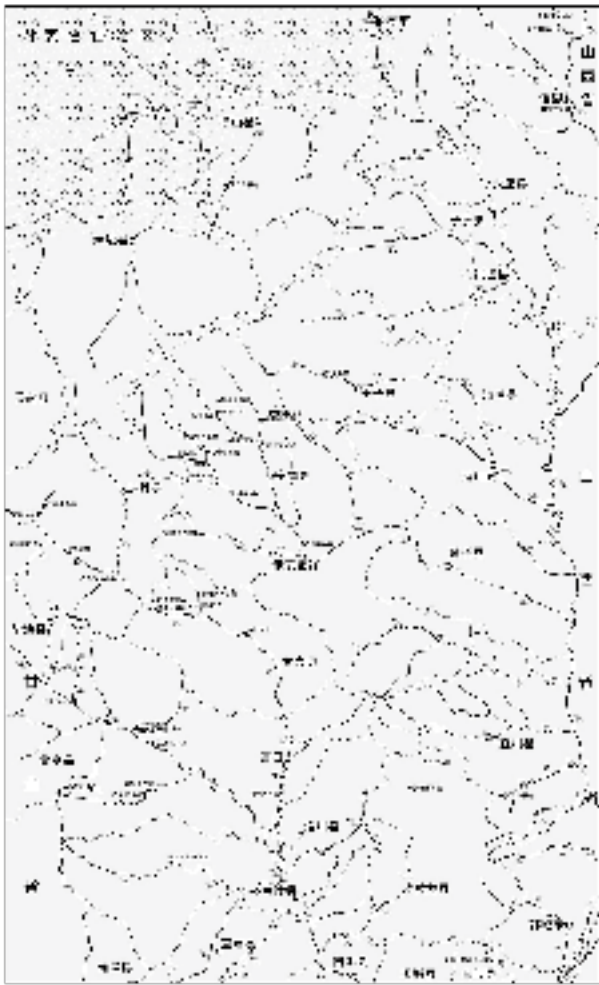
KEY WORDS:

grottos of the Song and Jurchen Jin dynasties in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types and combination of Buddhist images

陕西北部地区北宋、金代石窟数量居全国首位,形式多样且内涵丰富,呈现集群分布又一体化发展面貌。据笔者等三次比较系统的实地调查和学界披露资料¹,陕北宋、金石窟几乎遍及陕北高原,分布在以延安市为中心的区域〔图一〕,涉及至少13个市、县的近50个地点,每个地点洞窟数量由一个或几个到十几个不等。该市所属西部的富县、甘泉、志丹、安塞四县,西及陇东庆阳市所属合水县,亦即葫芦河、洛河、延河流域石窟分布密集,形成核心区域。延安市所属南部的黄陵、黄龙及邻接的渭南市所属合阳县,该市所属北部的子长及毗邻的榆林市所属佳县、横山县,以及该市所属东部的宜川县,石窟分布稀疏,形成外围区域。

陕北宋、金石窟北宋早中期实例稀少,北宋晚期获得实质性发展,少许开凿于金代早期。实例大多集中在11世纪60年代至12世纪50年代的一个世纪,其中11世纪90年代至12世纪20年代的约40年间为主要发展期。

就目前所知情况,陕北宋金时期石窟一概为佛教石窟,个别石窟掺杂着零星道教因素,独立的道教石窟全然不见。而且,大乘显教图像占有绝对优势,少数糅合了密教图像。其图像大多可以溯源至唐、五代,宋金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连同此时期新出现的少许图像,吻合陕北地域及新时代思想观念,通过重新排列组合,形成陕北宋、金石窟图像构成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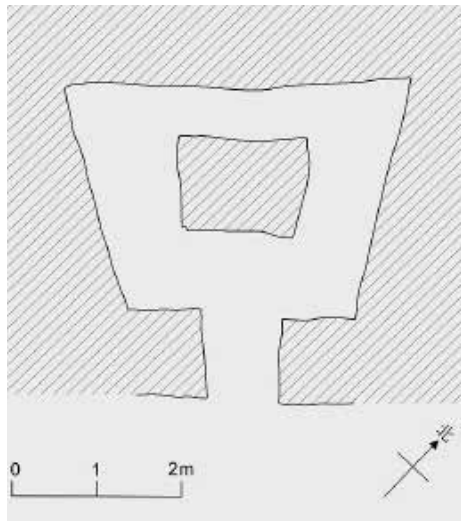


图一 陕北宋与金代石窟分布图(谷东方绘)

一 石窟结构

石窟为图像的载体,石窟结构与石窟规模、图像内容和组合密切相关。本稿选择32个保存比较完整的

¹ 笔者于2006年、2007年、2012年进行了三次调查,参加调查的还有清华大学研究生谷东方、李静、范丽娜、陈红帅、廖苾雅、林志镐、齐庆媛、黄文智、王芳、杨筱、孙明利,台北艺术大学教授林保尧及其助手李冠畿、陈怡安、徐逸泓、蔡秉彰,以及首都博物馆邢鹏。学界相关调查报告主要有张智《黄陵万佛寺、延安万佛洞石窟寺调查记》,《文物》1965年第5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黄陵县万佛洞〉介绍中有关问题的补充和订正》,《文物》1966年第2期。姬乃军《延安地区的石窟寺》,《文物》1982年第10期。靳之林《对〈延安地区的石窟寺〉一文的订正》,《文物》1984年第12期。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郿县石泓寺、阁子头寺石窟调查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员安志《陕西富县石窟寺勘察报告》,《文博》1986年第6期。延安地区文物普查队、子长县文物管理所《子长县钟山石窟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杨宏明《安塞县石窟寺调查报告》,《文博》1990年第3期。冉万里《陕西省安塞县毛庄科石窟调查简报》,《文博》2001年第1期。冉万里《陕西安塞县新茂台石窟调查简报》,《文博》2003年第6期。陕西省文管会《陕西文管会发现石公寺石窟及古遗址等》,《文物》1954年第11期。余苏生《甘泉县古佛寺石窟造像介绍》,《文博》1994年第4期。李圣庭《合阳梁山千佛洞石窟》,《文博》1989年第2期。董广强、魏文斌《甘肃合水安定寺石窟调查简报》,《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



图二 富县柳园北宋庆历三年(1043)石窟平面图
(齐庆媛绘)



图三 子长钟山北宋晚期第4窟(陈怡安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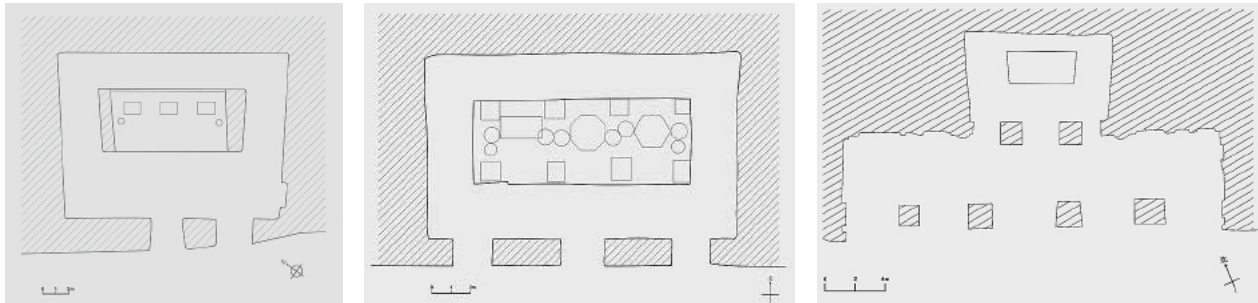
图四 安塞洞湾北宋晚期石窟



图五 富县马渠寺北宋崇宁五年(1106)第2窟

陕北宋、金石窟为考察对象,其中纪年与无纪年石窟各占半数,无纪年石窟基于石窟结构、图像内容和组合形式,参照纪年石窟而定。石窟结构分为中心柱窟(1例)、方形窟(2例)、后壁佛坛窟(9例)、中心佛坛窟(4例)、设屏壁佛坛窟(3例)、设支柱佛坛窟(9例)、前廊后室佛坛窟(4例)七种,以后壁佛坛窟、设支柱佛坛窟数量为多。前四种结构石窟小型窟、中型窟各占半数,后三种结构石窟半数为大型窟,中型窟、超大型窟各占约1/4。兹依据石窟面阔(含前廊)尺寸,划分为一米以上至四米的小型窟、四米以上至六米的中型窟、六米以上至十米的大型窟、十米以上的超大型窟四类。

中心柱窟〔附表1-1、图二〕,即在石窟中心偏后设置一根连接窟顶的支柱,仅见于北宋中期一例,继承了北朝、隋唐流行的中心柱窟结构,无关另外六种石窟。方形窟〔附表1-2、图三〕,为简单的一般化石窟,可因时因地开凿。后壁佛坛窟〔附表1-3、图四〕,即沿着石窟后壁设置长条形佛坛,类似于敦煌唐、宋时期方形覆斗顶窟后壁设置佛坛的情况,应受到此前类同的石窟或地面寺院影响。中心佛坛窟〔附表1-4、图五〕,即在石窟中间偏后设置佛坛。设屏壁佛坛窟〔附表1-5、图六〕,即在中心佛坛的左缘与右缘,或后缘与左右两缘设置连接窟顶的屏壁,屏壁用于承重窟顶的同时,又使佛坛形成相对独立的空间。敦煌唐后期、五代、北宋时期,流行在方形覆斗顶窟中心偏后设置佛坛,并在佛坛后缘设置连接窟顶的屏壁,中心佛坛加设屏壁的设置还见于五台晚唐佛光寺大殿,为当时石窟寺院与地面寺院通行的结构,这种构造应为陕北中心佛坛窟、设屏壁佛坛窟的渊源。设支柱佛坛窟〔附表1-6、图七〕,多数在中心佛坛的四角设支柱,还有少许在中心佛坛左右前角或后壁佛坛前方设两根支柱,以及在中心佛坛前后两缘各设四根支柱的情形,支柱主要用于承重窟顶,这是陕北宋、金石窟一种自发的设计结构。前廊后室佛坛窟〔附表1-7、图八〕,由设中心佛坛或后壁佛坛的后室,以及前廊(或附设支柱)组合而成,一概出现在陕北高原的西部、北部边缘地区。前文所述后五种佛坛窟结构相互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如设屏壁佛坛窟内存中心佛坛窟因素,设支柱佛坛窟内存中心佛坛窟或后壁佛坛窟因素,又前廊后室佛坛窟与设支柱佛坛窟关系密切。



图六 延安清凉山北宋熙宁九年(1076)第1窟平面图(谷东方绘) 图七 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平面图(谷东方绘) 图八 志丹城台北宋大观二年(1108)一金贞元三年(1155)石窟平面图(李静绘)

居绝对主流的佛坛窟,在佛坛上一般设圆雕群像,少许设高浮雕群像,多利用原地岩石雕刻,有的从他处雕刻之后移来。佛坛群像形成石窟礼拜中心。周壁浮雕造像多样,主次有别,一方面与佛坛群像呼应,而另一方面却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主体内涵,共同构成石窟的礼拜对象和空间。

依据所在位置主次和出现频率高低,陕北宋、金石窟佛教图像,大体分为主流图像与非主流图像两类,分别包含若干种具体图像,在石窟图像构成中发挥各自不同作用。

二 主流图像及其功能

在陕北宋、金石窟中,“三佛”、释迦佛、大日如来、骑狮文殊与乘象普贤菩萨、十六罗汉、涅槃与五百罗汉、水月观自在菩萨、千佛与万菩萨八种图像,屡次出现并多配置在重要位置。大多以“三佛”为主尊,少许以释迦佛为主尊,个别以大日如来为主尊,与另外一种或几种图像组合,主导着石窟图像构成,形成主流图像。

1. “三佛”

“三佛”,即结跏趺坐施无畏印释迦佛、倚坐施无畏印弥勒佛、结跏趺坐施禅定印阿弥陀佛组合。在陕北宋、金石窟中高频出现,已然成为习惯性表现¹。本文列举的32个实例中,14例以“三佛”为主尊,另有7例佛坛窟主尊造像缺失,依残存遗迹观察,当初很可能为“三佛”图像。以主尊形式表现的“三佛”,出现在中心柱窟以外的各种结构石窟,绝大多数设在后壁佛坛或中心佛坛上,个别设在后壁上。后壁佛坛及后壁上“三佛”左右横列,中心佛坛上“三佛”或左右横列或品字形排列。“三佛”图像还时常作为从属图像表现。

陕北石窟“三佛”图像,最早出现于富县柳园北宋庆历三年(1043)石窟,盛行于北宋晚期至金代早期。“三佛”排列位置高度一致,除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之外²,无论石窟方向如何,一概释迦佛居中,弥勒佛居左,阿弥陀佛居右,这是以石窟洞口为正方向(即南方)或假想洞口为正方向设计的结果,使得代表东方净土和西方净土的未来弥勒佛、西方阿弥陀佛处在相应部位。

“三佛”图像由唐代延续而来,并非出自某一经典,而是在净土信仰大发展背景中,表述民众的综合信

1 李静杰:《唐宋时期“三佛”图像类型分析》,《故宫学刊》第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2 该石窟中心佛坛释迦佛居中,阿弥陀佛居左,弥勒佛居右,此“三佛”利用原地岩石雕刻,可知为当初设计。其设计者似乎忽视了“三佛”各自属性与对应方位的关系,以致造成弥勒佛、阿弥陀佛位置相反的现象。

仰观念。对于一般信徒而言,无论东方净土还是西方净土,似乎没有多大本质上的不同,同样是观念中的理想世界。于是,出于对称构图的习惯,将代表娑婆世界的释迦佛安置在中央,代表东西方净土世界的佛陀配置在两侧。意味着处在娑婆世界众生,依释迦佛法勤于修行,期望将来往生到弥勒下生净土或西方极乐净土世界。处在后壁佛坛、中心佛坛或后壁上的“三佛”,成为石窟思想的核心并总摄全窟,亦即施主以将来往生净土世界为旨归,其他各种图像围绕这一主题配置在周围。此外,子长钟山北宋晚期第4窟“三佛”,分别配置在后壁与左右侧壁中央,相对位置依然如故,是为变通的“三佛”组合。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4窟后壁左中、右中部,分别配置一结跏趺坐施禅定印佛、一倚坐佛,应为阿弥陀佛、弥勒佛的对称表现,从中心佛坛支柱痕迹与天盖推测,当初佛坛表现结跏趺坐释迦佛的可能性最大。那么,该窟佛坛与后壁造像亦构成“三佛”组合,然弥勒佛与阿弥陀佛的位置颠倒,或可看作不经意设计所为。

2. 释迦佛

释迦佛为佛教教主,在列举32个实例中已知4例以之为主尊。另就佛坛遗迹观察,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4窟、富县马渠寺齐阜昌五年(1135)第3窟可能主尊也是释迦佛。虽作为主尊表现的释迦佛数量有限,但在石窟图像构成中发挥主导作用。

3. 大日如来

在延安市所属区县的宋金石窟中发现一批密教大日如来图像。这些图像有多种存在形式,或属于金刚界曼荼罗成身会内容,或为金刚界与胎藏界大日如来组合,或为金刚界大日如来与华严经毗卢遮那佛混合,反映了唐代密教艺术的后续发展状况。这些大日如来图像,仅前述富县柳园石窟作为主尊表现,其余作为次主尊或附属形式表现¹,组织在以净土信仰为核心的程式化图像体系之中,密教成就法身思想与显教往生净土、菩萨行等内涵,共同发挥教化众生的作用。

4. 骑狮文殊与乘象普贤菩萨

骑狮文殊与乘象普贤菩萨一对图像,在陕北宋、金石窟中屡次出现,呈现出固定的表现形式。在列举32个实例中就有11例,那些佛坛造像缺失的实例中也应占有一定数量,另有2窟的菩萨像台座基础雕刻狮头、象头,应视为其简化造型。骑狮文殊与乘象普贤菩萨多数配置在后壁佛坛窟的两侧壁,或设支柱佛坛窟主尊两侧前部,少许分布在其他结构洞窟,辅助主尊发挥作用。

骑狮文殊与乘象普贤菩萨作为一对图像,依据初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表现²,初唐已出现并流行开来,主尊一般不是经典中金轮佛顶像,而是表现在释迦佛两侧,或与毗卢遮那佛组合形成华严三圣³。这对图像在盛唐及其以后的发展中,更多地体现了华严经思想,大智文殊、大行普贤代表菩萨行,以华严三圣形式出现时,意在成就法身毗卢遮那佛。在陕北宋、金石窟中,骑狮文殊与乘象普贤菩萨大多表现在“三佛”两侧,富县柳园石窟开启了这种组合形式,少许表现在释迦佛两侧或大日如来两侧。通常,骑狮文殊、乘象

1 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大日如来图像类型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3期。

2 《陀罗尼集经》(《大正藏》第十八册)卷1《金轮佛顶像法》:“欲画其像。取净白叠若净绢布。(中略)结跏趺坐七宝庄严莲华座上。(中略)其下左边画作文殊师利菩萨,身皆白色,顶背有光,七宝璎珞、宝冠、天衣种种庄严,乘于狮子。右边画作普贤菩萨,庄严如前,乘于白象。”(第790页上)

3 (唐)澄观:《三圣圆融观门》(《大正藏》第四十五册):“三圣者,本师毘卢遮那如来,普贤、文殊二大菩萨是也。(中略)三圣之内,二圣为因,如来为果。”(第617页上)



图九 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2窟左壁骑狮文殊



图一〇 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2窟右壁乘象普贤



图一一 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2窟右壁文殊化现老人

普贤分别配置在“三佛”的左侧、右侧，二者相对位置与经典记述相应，个别实例二者位置相反，应是制作者主观变动的结果。二者从华严三圣中游历出来配置在“三佛”两侧，尽管没有经典教义上的直接关联，菩萨行的功能依然存在。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2窟左右侧壁，骑狮文殊、乘象普贤菩萨前下方各一善财童子合掌回首伫立〔图九、图一〇〕，《华严经》陈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始自文殊而终于普贤，从而这一组合可以代表五十三参全过程¹，表述了华严经菩萨行思想。

陕北宋、金石窟还见有骑狮文殊、乘象普贤菩萨与文殊化现老人组合的情形。文殊化现老人故事讲述²，初唐佛陀波利从西国来，巡礼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其时文殊化现老人从山中来，忠告佛陀波利，若不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来，灭众生一切恶业，徒劳无益，话音刚落老人便消失踪迹。佛陀波利遂返西国取回此经，在长安翻译并流通汉土。佛陀波利神异事迹，使得其人被赋予神僧色彩，乃至成为祈祷对象³。该故事使得文殊菩萨与五台山的联系更加紧密，佛教教化愈加富有人间气息。

现存文殊化现老人实例分立姿、坐姿两种。立姿者如延安清凉山第2窟右壁乘象普贤菩萨后上方，浮雕一浓须老者戴帽、拄杖踏云而来〔图一一〕。黄龙月坪北宋绍圣二年（1095）石窟右壁骑狮文殊后下方，一长须老者（头部被破坏）拄杖而来〔图一二〕。安塞新茂台北宋晚期石窟左壁骑狮文殊后上方，随从一拄杖者（头部风化）。此三者作行进姿态，前者踏云而来，与左壁骑狮文殊形成大组合，文殊后上方云头上拱手立者（头部被破坏）或许是佛陀波利，后二者与文殊菩萨形成小组合。坐姿者如子长钟山北宋晚期第4窟左

1 李静杰：《论宋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像》，《艺术史研究》13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唐）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大正藏》第十九册）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者，婆罗门僧佛陀波利仪凤元年（676）从西国来至此汉土，到五台山。次遂五体投地向山顶礼，曰，‘如来灭后众圣潜灵，唯有大士文殊师利于此山中汲引苍生，教诸菩萨。波利所恨生逢八难、不睹圣容，远涉流沙，故来敬谒，伏乞大慈大悲普覆，令见尊仪。’言已悲泣雨泪，向山顶礼，礼已举首，忽见一老人从山中出来，遂作婆罗门语谓僧曰，‘法师情存慕道追访圣踪，不惮劬劳远寻遗迹。然汉地众生多造罪业，出家之辈亦多犯戒律，唯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灭众生一切恶业，未知法师颇将此经来不？’僧报言曰，‘贫道直来礼谒，不将经来。’老人言，‘既不将经来，空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何得识。师可却向西国取此经将来，流传汉土，即是遍奉众圣，广利群生，拯济幽冥，报诸佛恩也。师取经来至此，弟子当示师文殊师利菩萨所在。’僧闻此语不胜喜跃，遂裁抑悲泪，至心敬礼，举头之顷忽不见老人。其僧惊愕倍更虔心，系念虔诚回还西国，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至永淳二年（683）回至西京。”（第349页中）（北宋）赞宁：《宋高僧传》卷2《佛陀波利传》记述，沿袭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的内容。孙修身已注意到文殊化现老人故事，以及文殊化身为贫女故事对清凉山石窟的影响，称作骑狮文殊、驭狮于闐王、佛陀波利组合为新样文殊图像，参见孙修身《陕西延安市清凉山万佛寺第2窟内容考》，《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笔者就清凉山第2窟佛陀波利、文殊化作老人的比定，与其文有所不同。

3 （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大正藏》第四十九册）卷46《法运通塞志》：元祐“七年（1092），颍川守臣苏轼言，‘佛陀波利塔院祈祷屡验，乞降敕额。诏赐‘光梵之院。’”（第417页下）



图一二 黄龙月坪北宋绍圣二年（1095）石窟右壁文殊化现老人



图一三 子长钟山北宋晚期第4窟左壁文殊化现老人



图一四 富县石泓寺金皇统元年（1141）—贞元二年（1154）第2窟左前柱右侧面文殊化现老人与水月观自在



图一五 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藏晚唐前后浮雕文殊化现老人

壁骑狮文殊后方，一头戴披风的长须老者席地而坐，两侧比丘和俗者拱手伫立〔图一三〕。富县石泓寺金皇统元年（1141）至贞元二年（1154）第2窟左前柱右侧面，浮雕一倚坐、戴披风、长须老者，两侧三人拱手伫立〔图一四〕。前者与文殊形成小组合，暗示这是文殊化现老人的表现，后者与左侧水月观自在并列且大小相仿，又大于二者之间的布袋和尚，说明类同于水月观自在尊格，也应是文殊化现老人的表现。此二老人以坐姿表现，两侧增加侍者，多少带有礼拜像的味道，脱离了原来的故事情节。文殊化现老人图像较早实例，见于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藏晚唐前后浮雕造像〔图一五〕¹，其头戴披风、拄杖二特征可能与陕北宋、金石窟有所关联。

骑狮文殊、乘象普贤菩萨身侧雕刻驭者的造型也时有所见，有些可能与文殊化身为贫女故事关联²，讲述五台山灵鹫寺岁首斋会之时，文殊菩萨化作贫女抱携二子，一犬随后，来寺乞食。母子与犬一时化身，贫女还原文殊之形，二子即善财童子、于闐王，犬为狮子。可知驭狮人为于闐王，驭象人推测出于对称构图考虑而表现，或可视为同一

1 该造像中间浮雕倚坐弥勒佛与阿难、迦叶弟子。右侧浮雕二菩萨，头部作佛形象，一立、一骑狮，骑狮者应为文殊菩萨。左侧一者披风帽拄杖而立，前方一比丘双手合十礼拜，即佛陀波利礼拜化作老人之文殊的表现。题记“胡僧西国来礼拜，文殊师利化作老人。一佛、二菩萨、阿难、迦叶”。图像与题记内容一致。朝日新闻社文化企画局大阪企画部编集《三藏法師の道（朝日新闻创刊百二十周年纪念特别展）》图版150，东京，朝日新闻社，1999年。图录解说题作“胡僧礼佛图”，不甚契合图像内涵。

2 （北宋）延一编：《广清凉传》（《大正藏》第五十一册）卷2《菩萨化身为贫女》：“大孚灵鹫寺者，九区归向，万圣修崇，东汉肇基，后魏开拓。不知自何代之时，每岁首之月大备斋会，遐迹无间，圣凡混同。七（疑‘其’之误，笔者）传者，有贫女遇斋赴集，自南而来凌晨届寺。携抱二子，一犬随之，身余无费，剪发以施。未遑众食告主僧曰，‘今欲先食，遽就他行。’僧亦许可，命僮与僕，三倍贻之，意令贫女、二子俱足。女曰，‘犬亦当与。’僧勉强复与。女曰，‘我腹有子，更须分食。’僧乃愤然语曰，‘汝求僧食无厌若是，在腹未生，曷为须食，’叱之令去。贫女被呵（应为‘呵’，笔者），实时离地，倏然化身即文殊像，犬为狮子，儿即善财及于闐王。五色云气霏然遍空。”（第1109页中、下）据《广清凉传》序，该传记成书于北宋嘉祐五年（1060）。

身份。另一则记述为¹：金天会十年（1132），朔州慈勇大师与门徒史法师等百余人，游五台山大华严寺。忽见祥云之中文殊乘狮子莲花座而来，于闾王驭狮，善财童子前导，佛陀波利随后。将文殊化现老人和文殊化身为贫女故事内容糅合在一起，前述延安清凉山第2窟左右壁图像与该故事所述如出一辙，又早于故事记述时间，说明至迟北宋晚期此故事已经流传来，抑或此故事依据图像而来亦未可知，足见该窟图像与五台山信仰关系之密切。

5. 十六罗汉

十六罗汉为陕北宋、金石窟习见图像，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信仰内涵。十六罗汉信仰及造像活动，自晚唐、五代以来日盛一日，入宋以后得力于皇帝倡导²，以及范仲淹、苏轼等文人士大夫的推动，获得进一步发展，这也是陕北宋、金石窟十六罗汉图像发达之因由。在列举32个实例中，以主体形式表现者占有13例，绝大多数为忠实于经典的十六身，个别实例为十五身或十七身，应为不经意造作所致。十六罗汉出现在各种结构和不同规格石窟之中，作为主体图像表现时配置在后壁或左右壁、前壁、后壁与左右壁、左右壁与前壁，还有较多随意填补在壁面或支柱侧面上的情况。

十六罗汉典出初唐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³，在释迦佛涅槃之后弥勒佛出世之前，护持并传承正法，是为罗汉主要功能。又强调释迦佛灭后，罗汉“及与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经过“人寿极短至于十岁，刀兵劫起互相诛戮”的极恶劣时代之后，人寿增至百岁，“厌前刀兵残害苦恼，复乐修善”时，十六罗汉及其眷属现于人间，饶益众生，直至过渡到弥勒下生成佛时人寿八万岁的丰乐世界。如此看来，十六罗汉住世还意味着人们逐渐远离杀戮、污秽的苦难世界，日益趋向太平、丰乐的理想世界，接下来便是弥勒下生净土世界，罗汉成为将人们带往美好世界的救世主，他们在无佛之世传承佛法并饶益众生，引导众生走向日趋美好的未来，已而罗汉信仰赢得民心，使得罗汉造像大行于世。

6. 涅槃（临终说法、入涅槃、金棺说法）与五百罗汉

陕北宋、金石窟涅槃图像可以分两种⁴，一为唐代涅槃图像模式的延续，已知三例，或与弥勒佛组合表述传法思想，或与升天思想关联⁵，本稿不做具体讨论。另一种为程式化涅槃图像，包括临终说法、入涅槃、金棺说法三个场面，呈现浓厚地域特征。它们出现并流行于北宋晚期至金代早期，已知八例，多出现在大中型

1 《广清凉传》卷3附录金代明崇撰《广清凉传续遗》：“朔州慈勇大师，未详受业名氏，其道行博识，遐迩钦伏。天会壬子（1132年）季夏游台山，与其徒史法师等百余人同宿真容院，史亦纯厚人也。一日游大华严寺，忽于寺侧见祥云自东而来，五彩毕具。又于云中现文殊大圣，处茵茵座，据狻猊之上，及善财前导、于闾为御，波离（应为‘波利’，笔者）后从。（中略）迤迤自西而去。观者千余人，四众欢喜，叹未曾有。”（第1126页下）

2 诸如《佛祖统纪》卷43《法运通塞志》：雍熙元年（984），“敕造罗汉像五百十六身，奉安天台寿昌寺。”（第399页下）五百十六身即五百罗汉与十六罗汉组合。又，同书卷45《法运通塞志》：熙宁“十年（1077），夏旱。上于禁中斋祷甚虔，夜梦神僧驰马空中，口吐云雾，觉而雨大霏。勅求其像，得之相国寺阁第十三尊罗汉，诏迎入内供养。”（第415页上）

3 《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大正藏》第四十九册，以下简称《法住记》）：“佛薄伽梵般涅槃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使不灭没。（中略）如是十六大阿罗汉，一切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脱等无量功德，离三界染，诵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勅故，以神通力延自寿量，乃至至尊正法应住，常随护持，及与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报。（中略）如是十六大阿罗汉护持正法饶益有情。至此南赡部洲人寿极短至于十岁，刀兵劫起互相诛戮，佛法尔时当暂灭没。刀兵劫后人寿渐增至百岁，位此洲人等厌前刀兵残害苦恼，复乐修善，时此十六大阿罗汉与诸眷属复来人中，称扬显说无上正法，度无量众令其出家，为诸有情作饶益事。如是乃至此洲人寿六万岁时，无上正法流行世间炽然不息。后至人寿七万岁时，无上正法方永灭没，时此十六大阿罗汉与诸眷属于此洲地俱来集会，（中略）一时俱入无余涅槃。（中略）至人寿八万岁时（中略）弥勒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世间。”（第13页）

4 李静杰：《中原北方宋辽金涅槃图像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3期。

5 延安清凉山北宋熙宁九年（1076）至元祐元年（1086）万佛洞左屏壁外面涅槃图与弥勒佛组合，安塞石寺河宣和元年至五年（1119～1123）第3窟左屏壁外面涅槃图与右屏壁外面弥勒佛对应表现，表述传法思想。子长钟山治平四年（1067）第3窟左壁涅槃图则与升天思想关联。

石窟，小型石窟仅占一例。一般配置在后壁与左右壁，少数全部配置在后壁。临终说法居中，入涅槃、金棺说法分别居左右侧，符合经典记述涅槃情节次序及对称构图法则。还出现入涅槃、金棺说法位置相反，入涅槃、金棺说法一并配置在左壁，以及只具备一个场面或两个场面的情况，属于变通式表现。图像融合了小乘与大乘涅槃的经典记述，表述思想大乘涅槃经为主，不过，常、乐、我、净的大乘涅槃思想已不像唐代那样突出，重心转变为孝道。譬如，金棺说法即释迦佛“为后不孝诸众生故”，从金棺出为摩耶夫人说法¹，而且四例入涅槃场面表现摩耶夫人从忉利天降下情形。涅槃图像中摩耶夫人出现，实际等同于表述孝道思想。

这种程式化涅槃图像所以出现和流行，一方面为宋代理学勃兴的思想背景使然，另一方面与佛教为寻求发展空间而提倡孝道的努力不无关联。北宋嘉祐七年（1062），契嵩撰成辅教篇，受到仁宗器重，赐号“明教大师”，又深得宰相韩琦、参政欧阳修赏识，名震于时²。指出佛教自来甚重孝道，然其说未章明于天下，以为与佛教徒宣扬不利有关。于是会通佛、儒，发明深意，著成孝论³。认为孝顺为至道之法，与天地同理。孝为戒之先，由戒而生众善，佛教五戒与儒家五常一致。父母为形生之大本，佛则能重其大本、报其大恩，是为极孝。辅教篇成书后约30年间，旨在宣扬孝道的程式化涅槃图像出现并流行于陕北，两者或许存在某种必然联系。

前述表现程式化涅槃图像的八个石窟，亦见有五百罗汉，五百罗汉围绕在涅槃图像周围。迄今仅知安塞新茂台北宋晚期石窟、安塞沐浴北宋晚期石窟，表现五百罗汉而不见涅槃图像，大体来说涅槃图像与五百罗汉相互伴生。由黄陵绍圣二年（1095）万佛寺石窟“铸造石空寺佛殿后壁一面伍百罗汉，并部徒共六百仕”题记，富县马渠寺崇宁五年（1106）第2窟“施主王松自法（同‘发’）心，造五百罗汉一堂”题记，以及富县阁子头北宋政和二年（1112）石窟“又打造石空一所，亦有释迦九士、五百罗汉”题记可知，相对涅槃图像而言，五百罗汉尤其受到重视。五百罗汉图像没有明确经典依据，推测受《法住记》内容与佛典中五百弟子概念双重影响，盛唐前后出现，入宋以后获得巨大发展。十六罗汉附着的护法、传法思想，以及拯救众生趋向理想世界的象征意义，在五百罗汉中应该依然存在。

五百罗汉与涅槃组合表现目前仅见于陕北宋、金石窟，一方面，五百罗汉与涅槃图像融为一体，罗汉继释迦佛之后传法的意图一〇分明了。安塞樊庄北宋元祐八年（1093）至政和三年（1113）第2窟左壁天宫与入涅槃图像之间〔图一六〕，以及前述富县马渠寺第2窟右壁摩耶夫人与入涅槃图像之间〔图一七〕，各自表现一托钵罗汉，应为“佛薄伽梵般涅槃时，以无上法付嘱十六大阿罗汉并眷属等，令其护持使不灭没”思想，直接转移到五百罗汉的表现，是为传法表现之明证⁴。另一方面，五百罗汉如千佛般布满壁面，还应具有拯救

1 （南齐）昙景译：《摩诃摩耶经》（《大正藏》第十二册）卷2：“于时阿难，（中略）即便合掌而白佛言，‘后世众生必当问我，世尊临欲般涅槃时复何所说，云何答之。’佛告阿难，‘汝当答言，世尊已入般涅槃后，摩诃摩耶从天来下，至金棺所。尔时如来为后不孝诸众生故，从金棺出，如师子王奋迅之势。（中略）汝可为后世诸众生辈，次第演说此经，名曰摩诃摩耶经。’”（第1013页上、中）

2 《佛祖统纪》卷46《法运通塞志》：嘉祐“七年（1062），藤州沙门契嵩，初得法于洞山聪禅师，至钱唐灵隐闭户著书，既成入京师见内翰王素，进辅教编、定祖图正宗记。上读其书，至为法不为身，嘉叹其诚，勅以其书入大藏，赐‘明教大师’。及送中书宰相韩琦，以视参政欧阳修。修览文叹曰，‘不意僧中有此郎。’黎明，同琦往净因见之，语终日。自宰相以下莫不争延致，名振海内。”（第413页上、中）

3 （北宋）契嵩：《镡津文集》（《大正藏》第五十二册）卷3《辅教篇下·孝论》：“叙曰，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虽然其说不甚著明于天下，盖亦吾徒不能张之，而吾尝慨然甚愧。（中略）遂著孝论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发明吾圣人大孝之奥理密意，会夫儒者之说，殆亦尽矣，吾徒之后学亦可以视之也。”（第660页上、中）

4 [日]水野さの：《中国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樊庄石窟について》，《密教图像》第27号，京都，密教图像学会，2008年。又，李静杰：《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及其图像》，《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

众生，并引导众生趋向理想世界之用意。南宋晚期杭州净慈寺田字形布局的五百罗汉殿¹，恰是罗汉“与施主作真福田”的有力佐证，并且已带有强烈民俗化色彩。在陕北宋、金石窟中，十六罗汉与五百罗汉几乎不重叠出现，表明石窟设计者十分了解这两种图像内涵的一致性，有意避免内容重复。

在五百罗汉图像中还见有取经场面，如前述安塞樊庄第2窟左壁后部，在一条崎岖山路上，前段虹桥上一者用力牵马，马后一者背挎草帽策马前行。后段一者挑担而来，前担经卷，后担佛像，其最后一比丘身背经篋拱手随后，此者或许即唐僧玄奘〔图一八〕。又如子长钟山北宋晚期第4窟后壁，在陡峭山路上，一者奋力挑担走来，前担佛像，后担经卷，其最后一比丘拄杖艰难攀登，或许泛指取经〔图一九〕。据文献记载，确凿的玄奘取经图像五代时已出现²，惜不知其细节。入宋以后，随着讲唱文学说话的发展，玄奘取经事迹被赋予传奇色彩并流行于民间，前述取经场面可能就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7. 水月观自在菩萨

水月观自在（或名水月观音）菩萨为陕北宋、金石窟普遍流行的图像，数量众多，见于各种石窟。观自在菩萨几乎为高浮雕造像，或作为次主尊表现在后壁中央，或成对表现，或随意填充壁面，同一石窟往往多次出现。其绝大多数观自在坐山岩上一腿垂下，同侧手扶地，另一腿支起，同侧手搭在膝盖上。少许观自在坐山岩上一腿垂下，一腿盘坐，或一腿盘坐，一腿支起，盘坐的一侧手扶地，支起的一侧手搭在膝盖上。

一般认为水月观自在菩萨原创于中唐周昉³，当年周昉作品

1 (南宋) 失撰人名：《古杭杂记》：“净慈寺乃祖宗功德院，侧有五百尊罗汉，别创一田字殿安顿，装塑雄伟。殿中有千手千眼观音一位，尤为精致。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湿毗尊者独设一龛，用黄罗为幙，幙之旁置签筒一座，其像侧身偃蹇、便腹斜目，觑人而笑。临安妇人祈嗣者必诣此炷香点祷，以手摩其腹，云有感应，日积月久，汗手加于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鉴。邪说诬民如此，又假此以为题化之端，敛掠民财不可胜计，其无忌甚矣。”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梦梁录〉及其他一种》第三册第3页，商务印书馆，1939年。

2 (北宋)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125《于役志》：景祐三年（1036）七月“甲申，与君玉饮寿宁寺。寺本徐知诰故第，李氏建国以为孝先寺，太平兴国改今名。寺甚宏壮，画壁尤妙。问老僧，云周世宗入扬州时以为行宫，尽朽漫之，惟经藏院画玄奘取经一壁独在，尤为绝笔，叹息久之。”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3 (唐)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胜光寺（中略）塔东南院，周昉画水月观自在菩萨掩障。菩萨圆光及竹并是刘整成色。”第61、62页，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图一六 安塞樊庄北宋元祐八年(1093)至政和三年(1113)第2窟左壁托钵罗汉



图一七 富县马渠寺北宋崇宁五年(1106)第2窟右壁托钵罗汉



图一八 安塞樊庄北宋元祐八年(1093)至政和三年(1113)第2窟左壁取经场景



图一九 子长钟山北宋晚期第4窟后壁取经场景

的风貌已无法确知,水月观自在菩萨祖形实源于印度¹,可能经周昉改造流行开来。水月观自在菩萨以山水为背景,十分契合华严经的记述²,华严经应为此菩萨流行的思想基础。而且,华严经之观自在菩萨继承了法华经的观世音诸难救济功能,声称“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怖畏”³。再者,水月观自在菩萨清净自在的品格与禅宗意趣不谋而合,迎合了宋代风行的禅宗思想。水月观自在菩萨造型洒脱,便于工匠发挥才智,又适于视觉观赏,于是其雕塑、绘画风靡于世。

陕北宋、金石窟水月观自在菩萨主要发挥现世救济职能,由于配置的具体部位不同,其作用也有所差别。其一,为次主尊表现。宜川贺家沟北宋崇宁二年三年(1103~1104)石窟、前述黄龙月坪石窟、安塞石寺河北宋宣和元年至五年(1119~1123)第3窟,三者均为佛坛窟,佛坛主尊像已不存,后壁中央配置水月观自在形成当窟的次主尊,突出其现世救济职能。其中黄龙月坪石窟后壁水月观自在左右侧,以相对较小的画面分别配置阿弥陀佛、弥勒佛,在强化观自在现世救济职能的同时,表述了施主将来往生净土世界的愿望。

其二,成对表现。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前壁中门左右侧上部、左右壁两侧上部,各自配置一对水月观自在。中心佛坛前缘四根支柱的前面上部,以及佛坛后缘中间两根支柱的前面上部,均对称配置水月观自在。安塞招安北宋元祐九年(1094)——崇宁元年(1102)第3窟左右壁中部、前壁门两侧,分别配置一对水月观自在。黄陵万佛寺石窟前壁门左右上方,夹千手观音配置一对水月观自在。前述延安清凉山第2窟左壁骑狮文殊前上方、右壁乘象普贤前上方,各一铺水月观自在成对配置。富县石泓寺第2窟中心佛坛两前角柱的前面中部、左右壁前端各自配置一对水月观自在。这些成对配置的水月观自在属于一次性设计,纳入石窟图像构成整体规划。前四者以“三佛”为主尊,娑婆世界众生将来往生净土世界为主要意图,后者以降魔成道释迦佛为主尊,用意在于消除战乱之人祸,发挥着辅助释迦佛救济现世众生的作用。但是,相对于作为次主尊表现形式,成对配置的水月观自在凸显装饰功能,救济功能明显减弱,在同一石窟中重复出现也说明了这种推测的可能性。

其三,填充式表现。在诸石窟壁面或支柱侧面,随意填充表现的水月观自在数量众多,多雕刻于主体图像完成之后,属于二次性设计,在图像布局中缺乏整体性。其发心制作者多为小施主,为自己或家人平安发愿,或为亡者往生净土雕刻,仍然强调了观自在的救济职能。在施主制作若干菩萨群像场合下,往往于其间雕刻一身相对大幅水月观自在作为诸菩萨的代表,观自在一侧刊刻施主发愿文。

在水月观自在图像左右下方,经常各自浮雕一组礼拜观自在的人物,可细分为两种表现形式。区别于第一种形式的一组人物中,一者牵马,马背驮经,马前往往有一比丘拱手或伏地礼拜观自在,该比丘可能即取经之玄奘。与之对应的另一组人物或为比丘,或为世俗人物。实例见于前述安塞招安第3窟右壁中部〔图

1 印度后笈多时代(6世纪中叶~8世纪中叶)埃罗拉石窟,出现一腿垂下,同侧手扶地,另一腿盘坐的菩萨造型。推测这种图像在盛唐前后传入中国。

2 (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第十册)卷68《入法界品》:“于此南方有山名补陀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中略)时善财童子(中略)渐次游行至于彼山,处处求觅此大菩萨。见其西面岩谷之中泉流萦映,树林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剛宝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令其摄受一切众生。善财见已,欢喜踊跃,合掌谛观。”(第366页下)

3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68《入法界品》:“(观自在)菩萨告言,(中略)‘善男子,我已成就菩萨大悲行解脱门。善男子,我以此菩萨大悲行门,平等教化一切众生相续不断。(中略)我住此大悲行门,常在一切诸如来所,普现一切众生之前。(中略)我修行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离热恼怖、离迷惑怖、离系缚怖、离杀害怖、离贫穷怖、离不活怖、离恶名怖、离于死怖、离大众怖、离恶趣怖、离黑闇怖、离迁移怖、离爱别怖、离怨会怖、离逼迫身怖、离逼迫心怖、离忧悲怖。复作是愿,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怖畏。善男子,我以此方便令诸众生离怖畏已,复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第367页上)



图二〇 安塞招安北宋元祐九年（1094）至崇宁元年（1102）第3窟右壁水月观自在

图二一 富县石泓寺第2窟左前柱前面水月观自在（陈怡安摄）



图二二：1 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前壁水月观自在（陈怡安摄）

图二二：2 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前壁水月观自在右下（陈怡安摄）

图二二：3 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前壁水月观自在左下（陈怡安摄）

二〇）、宜川贺家沟石窟后壁中部、子长钟山北宋政和二年（1112）第5窟右壁中部、富县石泓寺第2窟左前柱前面〔图二一〕、石泓寺第2窟右壁前部等，当初应来源于共同的粉本。第二种形式不见马及驭者，实例仅见于前述子长钟山第3窟前壁右侧上下两幅，上幅水月观自在下方左侧二比丘一跪、一立供养。右侧四人，一者袒裸上身，肩扛大旗，另三者均戴冠、伫立、捧物供养，似乎与玄奘取经无关〔图二二：1、图二二：2、图二二：3〕。之所以在水月观自在图像中出现礼拜者或取经场面，如前贤所述¹，可能与玄奘关于布咀洛迦山的记述有关²。此外，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2窟左右壁，骑狮文殊、乘象普贤菩萨前上方，浮雕一对善财童子参访补怛落迦山观自在菩萨，由此得大悲行法门，反映了与华严经菩萨行思想的关联。子长钟山第3窟左壁中部水月观自在，左右侧分别浮雕善财童子、龙女，可能体现了禅宗渐修、顿悟思想〔图二三〕³。在水月观自在图像中添加故事场面，赋予画面动态感，增强了其造型的生命力。

1 [日] 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第五章第五節《水月觀音圖》，第344～354頁，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7年。又，王惠民：《敦煌水月觀自在像》，《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

2（唐）玄奘、辯机：《大唐西域记》卷10：“秣罗矩吒国）布咀洛迦山，山径危险，岩谷敬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流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厉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3 前引李静杰：《论宋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像》。



图二三 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左壁水月观自在

8. 千佛或万菩萨

千佛为陕北宋、金石窟比较流行的图像。在列举的32例中有五例,多数处在大中型石窟。北宋中期一例,北宋晚期四例。千佛浮雕在窟室四壁、屏壁和支柱上。安塞沐浴北宋晚期石窟以外,表现千佛的石窟几乎不见五百罗汉。千佛为十六国北朝以来普遍流行的图像,多依据千佛名号经表现。千佛名号经基于千佛时空范围的差异可分两种,一种侧重时间观念,以三劫千佛名经为代表,即《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未来星宿劫千佛名经》,各有阙译人名附梁录、开元拾遗附梁录两个版本,前者教化内容更为丰富。此诸经典罗列三劫千佛名号,并陈述礼拜供养十

方三世诸佛、净心忏悔,可灭永劫生死之罪,得无量福乃至成佛¹。其中,阙译人名附梁录《现在贤劫千佛名经》,详细地阐述了与忏悔关联的因果报应,内容涉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三戒,以及皈依三宝、修塔造寺的功德。此外,两个版本的《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未来星宿劫千佛名经》,均提及礼拜十方三世诸佛者,将来往生无量寿佛国。另一种侧重空间观念,以(北周建德元年写本)失译《十方千五百佛名经》为代表,强调礼拜供养现在十方诸佛,可灭永劫生死之罪。以上可见,礼拜供养十方三世诸佛之利益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能够灭罪得福,其二往生净土乃至成佛。

陕北宋、金石窟千佛图像没有相应榜题,无法确切了解所依据经典。有两个实例提供了一些线索,一者为前述富县柳园石窟,后壁主体高浮雕“三佛”(释迦佛、弥勒佛、阿弥陀佛),左右壁与前壁布列千佛。左右壁上部中间分别浮雕弥勒佛、阿弥陀佛,与千佛融为一体,画面大于千佛又小于后壁“三佛”,而且内容与“三佛”中两者重复,因此左右壁二佛与后壁“三佛”不成组合。推测左右壁东方弥勒佛、西方阿弥陀佛,主要用来标示千佛的空间方位,亦即十方诸佛。另一者为志丹何家峁北宋绍圣二年(1095)石窟,后壁与左右壁布列千佛,左右两壁前下部分别高浮雕大体量弥勒佛、阿弥陀佛,主要功能象征东方与西方净土世界,次要功能可能用来标示千佛的空间方位。然而,陕北石窟千佛为三劫千佛还是贤劫千佛,其他石窟千佛是否也具有方位内涵,难得而知。这样看来,此诸千佛图像可能具有使礼拜供养者灭罪得福、往生净土乃至成佛之功效。

万菩萨并非特定题材,也没有专门的经典依据。在诸多大乘经典中一再出现某数量之万菩萨语句,围绕着菩萨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职能述说。一者修菩萨行以期将来成佛,再者满足众生愿望,推测这两种职能正是万菩萨像得以流行的缘由。晚唐时期五台山发生过祥云之中现文殊、万菩萨的传闻²,北宋早期敕令在五

1 譬如,阙译人名附梁录《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大正藏》第十四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三劫诸佛世尊名号,欢喜信乐,持、讽、读、诵而不诽谤,或能书写为他人说,或能画作、立佛形像,或能供养香华伎乐,叹佛功德至心作礼者,胜用十方诸佛国土满中珍宝、纯摩尼珠积至梵天,百千劫中布施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供养是诸佛已,后生之处历侍诸佛,至于作佛而无穷尽,皆当为三世三劫中佛而所授决,所生之处常遇三宝,得生诸佛刹土,六情完具,不堕八难,当得诸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具足庄严。若能五体投地作礼,口自宣言‘我今普礼一切十方三世诸佛,愿三涂休息,国丰民安,邪见众生回向正道,发菩提心。持此功德,愿共六道一切众生无量寿佛国,立大誓愿,使诸众生悉生彼刹,身诸相好、智慧辩才如阿弥陀佛,所获果报巍巍堂堂,寿命无量。”(第365页上中)

2 《佛祖统纪》卷42《法运通塞志》:“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中略》河东节度使裴度奏,‘五台佛光寺庆云见,文殊大士乘师子于空中,从者万众。上遣使供万菩萨,是日复有庆云见于寺中。”(第384页中)

台山真容院造金铜文殊、万菩萨像¹，文殊与万菩萨组合提示，其指导思想应为华严经²。万菩萨图像见于前述子长钟山第3窟、延安清凉山第1窟、富县石泓寺第2窟，三者均属于超大型石窟，其菩萨像如同千佛一样浮雕在四壁、屏壁和支柱上。其中，前者中心佛坛前檐题记“张行者发心打万菩萨堂”，后者后壁题记“黑水乡赵氏，观自在一尊、小万菩萨七十尊”，说明当时确实称其菩萨群像为万菩萨。此三石窟中不乏文殊、普贤、水月观自在，由此而言，可能依然以华严经为指导思想。

以上八种图像涵盖了陕北宋、金石窟的基本内容，这些图像反复出现，呈现程式化特征，亦因此而成为显著的区域性特征。

三 非主流图像及其功能

在陕北宋、金石窟中，十二圆觉菩萨、千手观音菩萨、日月光菩萨、观音救难与摩利支菩萨、地藏菩萨与十王、阿育王施土因缘与罗睺罗受记因缘、僧伽和尚、布袋和尚、三教像九种图像，出现频率相对较低，除前两种以外，多配置在次要或不甚重要部位，在石窟图像构成中辅助主流图像发挥作用，形成非主流图像。

1. 十二圆觉菩萨

十二圆觉菩萨出《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³，记述佛应文殊师利等十二大菩萨相继提问，次第宣说圆觉的义理和观行，以开发修行者心性。中唐宗密注疏圆觉经且施用于修行实践，将十二圆觉菩萨修证归纳为顿悟——渐修——顿悟的过程，盛行于学界，并与华严经有机地结合起来。实例仅见于安塞黑泉驿北宋晚期石窟，该窟后壁佛坛造像已消失，左右壁高浮雕十二圆觉菩萨〔图二四〕，与主尊关系已无从考证。

2. 千手观音菩萨

千手观音菩萨出自初盛唐翻译的一组千手观音陀罗尼经，宣称诵持此经可消解不数灾厄，获得种种利益，譬如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之类，以及观音诸手印相、持物之功用⁴。此诸经典并非一一述说千数之手，而是以陈述十八、或四十、或四十二只主手的方式，代表千手的用途，其观音作一头形象。晚唐三昧苏嚩罗译《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除以四十手代替千手陈述之外，还述及其观音作十一面形象⁵，将十一面观音与千手观音结合起来。

延安清凉山第1窟左壁中间观音立像十一面、十八手，黄陵万佛寺石窟前壁门上方观音立像六面、

1 《佛祖统纪》卷43《法运通塞志》：太平兴国“五年（980）正月，敕内侍张廷训往代州五台山，造金铜文殊、万菩萨像，奉安于真容院。”（第397页下）

2 （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第十册）卷45《诸菩萨住处品》：“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已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第241页中）北京房山万佛堂唐大历五年（770）汉白玉浮雕菩萨群像，推测亦与此经典记述关联。

3 即（唐）佛陀多罗译《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大正藏》第十七册）。一说此经出自中土大德之手。

4 （唐）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大正藏》第二十册）：“观世音菩萨（中略）白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呪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希求故。’”（第106页中）

5 （唐）三昧苏嚩罗译《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大正藏》第二十册）：“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是观自在菩萨为众生故，具足千臂其眼亦尔。我说彼者其有千条，唯今略说四十手法。其四十手今分为五，何等为五，一者如来部，二者金刚部，三者摩尼部（唐言宝），四者莲华部，五者羯磨部（唐言事业）。一部之中各配八手（合为四十），其五部中亦有五法。’（第120页上）“首持发髻冠，宝冠绀发垂，顶上十一面，皆如上所说，诸头宝冠中，安住化身佛。菩萨于身上，具足四十手，一一手掌中，各有一慈眼，随诸众生类，执持杂宝物。”（第125页上）



图二四 安塞黑泉驿北宋晚期石窟左壁十二圆觉菩萨局部



图二五 黄陵北宋绍圣二年(1095)万佛寺石窟前壁千手观音

四十二手〔图二五〕。此二实例，如果仅以手臂数量而言各有对应经典，但手印、持物多有不合者，头数亦不对应。《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兼有多面、多臂内容，但不能同时对应上述实例的头与手臂数量，手印、持物亦有不合者。因此，此二实例综合千手观音经与十一面观音经造型的可能性很大。黄陵万佛寺石窟千手观音浮雕于前壁门口正上方，掌控门户且处在中轴线上，庇佑进入石窟中众生消灾得福之用意一目了然。

3. 日月光菩萨

日光、月光菩萨一般作为诸菩萨群体中的两者出现，而在药师经中身份则是二上首菩萨，该经应为日光、月光菩萨造型的主要依据。药师经为致福消灾之法，南朝宋世已译出流传，然词意不达，以至后世重译流通。现存三译本分别为隋达摩笈多译《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初唐玄奘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初唐义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三译本内容大体相同，包括十二大愿、九横死、十二药叉三个主要方面。所不同者，义净译本述及七佛本愿，余二者但言药师琉璃光佛本愿。三译本均提及药师琉璃光佛国土之中有二菩萨，持彼佛法藏，达摩笈多译本名为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余二者称作日光遍照、月光遍照菩萨。由此而言，日月光菩萨可以代表药师经，具致福消灾之功用，诱导众生往生药师琉璃光佛净土¹。

前述黄陵万佛寺石窟，甬道左右壁后端浮雕一对立菩萨像，各自手执长茎云朵托，云朵托上附着一圆盘，圆盘处在云朵之上，自然与日、月关联。尽管二圆盘上墨书题记日、月为后世字迹，推测当初亦应如此，圆盘亦即日光、月光菩萨之身份标识。前述富县石泓寺第2窟左前柱后面上端、同窟右前柱右侧面上端，分别浮雕一身结跏趺坐菩萨，各自手执长茎云朵托，托上附着圆盘，亦应是日光、月光菩萨〔图二六、图二七〕，二者配置部位略有不同，但大体对称，所在石窟高处亦关联其身份。

4. 观音救难与摩利支菩萨

观音救难图像见于前述富县柳园石窟后壁左上部、安塞招安第3窟前壁门右侧、富县石泓寺第2窟右壁前部，三者均为救八难图像形式，主尊为水月观自在造型。前二者造型简略，保存不佳，图像模糊难辨。后

¹ 《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大正藏》第十四卷）：“尔时佛告曼殊室利，‘彼药师琉璃光如来行菩萨道时，所发大愿及彼佛土功德庄严，我于一劫若过一劫说不能尽。然彼佛土纯一清净，无诸欲染亦无女人及三恶趣苦恼之声。以净琉璃而为其地，城阙宫殿及诸廊宇轩窗罗网皆七宝成，亦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于彼国中有二菩萨，一名日光遍照，二名月光遍照，于彼无量菩萨众中而为上首，能持彼佛正法宝藏。是故曼殊室利，若有净信男子、女人，应当愿生彼佛世界。’”（第413页下）

者浮雕于金皇统四年（1144），真实地反映了陕北宋、金石窟观音救八难图像的面貌¹。

富县石泓寺第2窟左前柱左侧面，刊刻金贞元二年（1154）造摩利支菩萨像题记²。该题记处在岩石断裂带补砌的石条上，周围不见相应的摩利支菩萨图像。南宋建炎元年（1127），隆祐太后以摩利支菩萨为保护神的事情³，曾造成较大社会影响，至建炎三年（1129）三月金人攻占鄜州（即富县）以前，其事或许已经传来此地，石泓寺第2窟摩利支菩萨题记尽管刊刻于金代，受上述事情影响之可能性依然不小。

石泓寺第2窟主尊为降魔成道释迦佛，意在降伏战乱之魔，观音救难用于现世救济，摩利支菩萨则用来消除灾祸，示意施主期望借助开窟造像功德，走出现实困境的心理。

5. 地藏菩萨与十王及地狱

地藏菩萨在释迦佛灭度之后，弥勒成佛以前，誓愿度尽地狱众生。作为幽冥世界的救难者，地藏菩萨赢得民众极大信仰热情，唐宋时期这种造像盛行一时。据不完全统计，在延安市所属7个区县的8个宋金石窟中，见有10例地藏菩萨（附表2），时间延续一个世纪。姿态分四种，半跏趺坐者占有一半，另一半包括结跏趺坐、倚坐、站立三种。一概着僧装，半数披帽，子长钟山第3窟所见3例头有发髻、戴冠。两手或托宝珠，或持锡杖，或二者兼有，由两手圆圈状握姿推测其锡杖原初应为附加木杖，今已不存。在地藏菩萨小组中，多数见有十王，有的兼有闵公、道明和尚，有的见有道明和尚、狮子，或只有狮子〔图二八、图二九、图三〇〕。还有两例与水月观自在形成一对图像，另有一例与地狱图像组合。

包括伪经在内有关地藏的显教经典记述⁴，地藏菩萨作沙门像或声闻像，亦即比丘形貌，僧装符合这一标准。头有发髻、戴冠，则局部保留着菩萨形貌，象征地藏之身份，这种造型比较少见。据松本荣一研究⁵，地



图二六 富县石泓寺金皇统元年（1141）至贞元二年（1154）第2窟左前柱后面日（月）光菩萨



图二七 富县石泓寺金皇统元年（1141）至贞元二年（1154）第2窟右前柱右侧面日（月）光菩萨（林保尧摄）

1 李静杰：《乐至与富县石窟浮雕唐宋时期观音救难图像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4期。

2 云“燕京北契宁坊住人王信，打造南无摩尼枝菩萨一尊。愿合家老幼平安，亡过者生天见佛。每日持念一百遍。贞元二年正月初九日，王信记。”

3 《佛祖统纪》卷47《法运通塞志》：“建炎元年（1127），上驻蹕维扬。初，隆祐太后孟氏将去国南向，求护身法于道场大德，有教以奉摩利支天母者。及定都吴门，念天母冥护之德，乃以天母像奉安于西湖中天竺，刻石以纪事。”（第423页中）

4 譬如，（唐）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大正藏》第十三册）卷1《序品》：“尔时世尊告无垢生天帝释曰，‘汝等当知，有菩萨摩訶萨名曰地藏，已于无量无数大劫、五浊恶时、无佛世界成熟有情，（中略）作声闻像将来至此，以神通力现是变化。（中略）此大菩萨是诸微妙功德伏藏，是诸解脱珍宝出处，是诸菩萨明净眼目，是趣涅槃商人导首，如如意珠雨众财宝，随所希求皆令满足。’”（第721页下）

5 [日]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第五章第七节《被帽地藏菩萨图》，第368～401页。



图二八 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
(1067) 第3窟前壁地藏



图二九 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 (1067)
第3窟前壁地藏十王 (陈怡安摄)



图三〇 安塞樊庄北宋元祐八年 (1093) 至政和三年 (1113) 第2窟
后壁地藏十王

藏披帽造型及道明和尚、狮子三因素，契合藏经洞出土 S3092 号纸卷引述已经失传的《还魂记》部分内容¹。托宝珠、持锡杖造型有典可据²，云地藏菩萨满足众生各种愿望像如意珠出生众宝一样，足见宝珠象征意义之重要。闵公其人及其与道明和尚形成父子关系，见于清代佛教文献³，陕北石窟一再出现这一对图像的情况表明，相关事迹似于北宋已经流传。

十王见于敦煌藏经洞出土《阎罗王授记经》等中土伪经，讲述亡者鬼魂在一七日至七七日、百日、一年、三年的十个斋日，依次接受十王审判，依据亡者生前的善恶行为，决定其将来往生六道的不同阶次，期间地藏协助十王，以保障审判的公平、公正。地藏经典中也讲述了地狱场景，地狱与十王审判又联系在一起。地藏与观自在组合造像则继承了唐、五代以来传统，反映了民众希望获得从现世救济到地狱救济的愿望。十王信仰使得因果报应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使人们居心向善、供养三宝，影响范围不只庶民阶层，乃至欧阳修之辈文人士大夫⁴。

此外，前述宜川贺家沟石窟还见有天藏菩萨，天藏为第十地菩萨，同出于地藏关联经典⁵，是为与地藏菩萨组合表现的依据。

6. 阿育王施土因缘与罗睺罗受记因缘

前述黄陵万佛寺石窟左壁前端，高浮雕一跏趺、托钵游行的佛陀大像。两脚前方浮雕二小儿，一者伸手

1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二十五册第 667、668 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前引笔者《乐至与富县石窟浮雕唐宋时期观音救难图像分析》引文，遗漏该纸卷尾端有关文殊菩萨化现狮子的内容。

2 (唐五代之际) 藏川述《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卍续藏经》第一册)：“尔时世尊告乞叉底摩波菩萨言，‘善哉善哉，谛听，地藏于未来世为缘现身，我当授记六种名字。’颂告言，‘预天贺地藏，左持如意珠，右手说法印，利诸天人众。放光王地藏，左手持锡杖，右手与愿印，雨雨成五穀。’”(第 406 页下)

3 (清) 仪润《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续藏经》第六十三卷) 卷 3：“地藏降迹新罗国主，姓金，号乔觉。永徽四年 (653)，年二十四岁祝发，携白犬善听，航海而来。至江南池州府东青阳县九华山，端坐九子山头七十五载，至开元十六年 (728) 七月三十夜成道，计年九十九岁。时有闾老闵公素怀善念，每斋百僧必虚一位，请洞僧 (即地藏，笔者) 足数。僧乃乞一袈裟地，公许，衣遍覆九峰，遂尽喜舍。其子求出家，即道明和尚，公后亦离俗网，反礼其子为师。故今侍像，左道明右闵公，职此故也。”(第 402 页下)

4 《佛祖统纪》卷 45《法运通塞志》：熙宁五年 (1072) “七月，欧阳永叔自致仕居颍上，日与沙门游，因自号六一居士。(中略) 临终数日令往近寺，借华严经，读至八卷，倏然而逝 (见外传)。永叔初登政府，苦于多病，尝梦至一所，见十人冠冕列坐。一人曰，‘参政安得至此’。永叔问曰，‘公等非释氏所谓冥府十王乎。’曰，‘然。’因问，‘世人饭僧、造经果有益否？’曰，‘安得无益。’既寤，病良已，自是益知敬佛。”(第 414 页中)

5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 3《无依行品》：“尔时会中有大梵天名曰天藏，久殖善根，住第十地，具诸菩萨摩訶萨德。”(第 734 页下)

前指，一者合掌随喜。小儿上方空中悬浮七级佛塔〔图三一〕。对应的右壁前端中部，高浮雕一大一小两佛陀相对而立，小佛陀合掌致礼，大佛陀伸右手欲抚摸小佛陀头顶〔图三二〕。如所指出，是为阿育王施土因缘、罗睺罗受记因缘的表现，分别表述了反对战争、忍辱是福的思想¹，比较符合当时社会背景。然二因缘故事的直观用意也不可忽视，阿育王凭借前世施土功德做转轮圣王²，至于罗睺罗受记有小乘和大乘的不同，小乘受记得阿罗汉果，大乘受记



图三一 黄陵北宋绍圣二年（1095）万佛寺石窟左壁 阿育王施土因缘



图三二 黄陵北宋绍圣二年（1095）万佛寺石窟右壁罗睺罗受记因缘

则得佛果，又以供养无量无数佛为前提³，本窟罗睺罗作佛陀形貌，显然为大乘受记表现。亦即通过布施、供养诸佛之功德，将来得到善报乃至成佛，契合该窟“同成佛果”、“早成佛道”题记内容。罗睺罗受记图像还见于安塞石寺河石窟右屏壁内侧面，应表述受记成佛思想。

7. 僧伽和尚

僧伽和尚本中亚何国人，初唐后段来至江淮建寺，人称观音菩萨化身，以比丘身得度，能预知祸福，神变无方，晚唐时期发展为民间崇拜偶像⁴。北宋真宗时再加尊号⁵，其神僧尊格愈加彰显。

已知两个陕北宋金之际石窟见有僧伽和尚图像，其一处在前述安塞石寺河第3窟后壁中间左侧，僧伽和尚结跏趺坐在亚字形基础仰莲台座上，头部残缺，由肩部残存的披巾可知原来头戴风帽，身着交领袈裟表明

- 1 李淦：《黄陵双龙千佛洞的图像、作者与观念》，《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第67～10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 2（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大正藏》第五十册）卷1《本施土缘》：“婆伽婆住王舍城迦兰陀竹林。尔时世尊日时已到，着衣持钵，将诸比丘前后围绕，向王舍城次行乞食。（中略）世尊与阿难在巷中行，见二小儿，一名德胜是上族姓子，二名无胜是次族姓子。弄土而戏，以土为城，城中复作舍宅仓储，以土为妙着于仓中。此二小儿见佛三十二大人之相庄严其身，放金色光照城内外，皆作金色无不明彻，见已欢喜。德胜于是擲仓中土名为妙者，奉上世尊，无胜在傍合掌随喜。（中略）佛言，‘我若涅槃百年之后，此小儿者当作转轮圣王，四分之一，于花氏城作政法王，号阿恕伽。分我舍利而作八万四千宝塔，饶益众生。’”（第99页）
- 3（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大正藏》第四册）：“时罗睺罗礼佛已讫，正在如来左足边立，如来即以无量劫中所修功德相轮之手，摩罗睺罗顶。（中略）即说偈言，‘（中略）此亦当出家，重为我法子，略言其功德，出家学真道，当成阿罗汉。’”（第497页中）又，（十六国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大正藏》第九册）卷4《授学无学人记品》：“尔时，佛告罗睺罗，‘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蹈七宝华如来。（中略）当供养十世界微尘等数诸佛如来，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16页上）
- 4《宋高僧传》卷18《僧伽传》：“释僧伽者葱岭北何国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中略）次历江淮，当龙朔初年（661年）也。（中略）中宗孝和帝景龙二年（708）遣使诏赴内道场。（中略）四年（710）（中略）俨然坐亡。（中略）观音菩萨化身也，经可不云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现之沙门相也。（中略）或预知大雪，或救旱早雨，神变无方，测非恒度。（中略）燕使遂图貌而归，自燕、蜀展转传写无不遍焉。（中略）天下凡造精庐，必立伽真相，榜曰‘大圣僧伽和尚。有所乞愿，多遂人心。（中略）弟子木叉者以西域言为名，华言解脱也，自幼从伽为剃发弟子，然则多显灵异。（中略）弟子慧俨未详姓氏，生所恒随师僧伽，执侍瓶钵。（中略）中宗别敕度俨并慧岸、木叉三人，各别赐衣钵焉。”第448～452页，范祥雍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 5（南宋）《宋大诏令集》卷223《政事·道释》：“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壬子，（中略）眷彼清淮，峙兹妙塔。示园明之惠力，存妙寂之法身。俾荐名称，用甲严奉。泗州僧伽大师，宜加号曰‘普照明觉大师’，其伽字公私文字不得指斥。仍遣屯田员外郎孟隆说往彼致告。”第8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图三三 安塞石寺河北宋宣和元年至五年（1119～1123）第3窟后壁水月观自在与僧伽和尚（李冠羲摄）



图三四 富县石泓寺金皇统元年（1141）至贞元二年（1154）第2窟后壁僧伽和尚（陈怡安摄）

其比丘形貌，两侧各胁侍一比丘，应为僧伽之弟子慧岸、木叉¹。该像与右侧水月观自在并列表现，且大小相仿，示意二者尊格对等，同时内涵僧伽为观音化身的用意，可能被赋予相应的救世功能〔图三三〕。

其二在前述富县石泓寺第2窟后壁右侧，上、下方分别浮雕一幅僧伽和尚像，下方者头部缺失，肩部残留披风。两者均结跏趺坐仰莲台座上，身前置三足几，着僧装，头戴风帽，两侧各胁侍一比丘、一俗者〔图三四〕。其比丘合掌而立，推测为木叉，其俗者束发高髻，左手执净瓶，据僧伽传描述的弟子持物推测为慧俨，但不明作俗者形象之缘由。上方僧伽和尚与倚坐弥勒菩萨毗邻雕刻，且大小相近，又在下方补刻一水月观自在，尽管排列不很齐整，推测此三者依然形成组合关系。僧伽和尚与水月观自在组合，示意僧伽和尚为观音化身。与弥勒菩萨组合，吻合敦煌藏经洞出土伪经《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内容²，云僧伽和尚不忍见恶世刀兵竞起，与弥勒一起下生阎浮提救度众生。此像与弥勒组合且处在窟室高处，与其将要下生阎浮提救度众生的表现一致，十分契合该窟主题思想。再者，该经强调僧伽和尚救度对象为孝顺父母之人，值得特别注意，表述孝道思想或许是僧伽和尚图像流行的又一原因。

8. 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法号契此，晚唐、五代之际活动于宁波地方。其人大腹便便，不修边幅，居无定所，言语无遮。常以杖挑布袋行乞于街坊店铺，鱼肉荤腥来者不拒，百般供具充满布袋。时传其人为弥勒化身，能示人吉凶，死后尚有人见之行乞于他方，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³。宋金之际布袋和尚图像流行于陕北石窟。

实例见于四个石窟，一概高浮雕，造型比较接近。体态丰腴，袒胸露乳，一腿盘坐，一腿支起，或倚、或靠、或握布袋而坐。所在位置及功能又有所差别，佳县云岩寺北宋政和四年（1114）第3窟前廊后壁布袋和尚，

- 1 参见《佛祖统纪》卷46《法运通塞志》：宣和元年（1119）“三月，京师大水。（中略）俄而泗州大圣见于大内，凝立空中，旁侍慧岸、木叉。上焚香拜祷。大圣振锡登城诵密语，顷之，一白衣裹巾跪于前，若受戒喻者。万众咸视，疑龙神之化人也。既而水退，诏加僧伽大圣六字师号。”（第421页下）
- 2 《敦煌遗书》中土伪经《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大正藏》第八十五册）：“吾告于阎浮提中善男子善女人，‘吾自生阎浮，为大慈父教化众生，轮回世间。（中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慈心孝顺，敬吾形像，长斋素食，念吾名字，如是之人散在阎浮。吾愍见恶世力（刀？，笔者）兵竞起，一切诸恶逼身不得自在。吾后与弥勒尊佛下生本国，（中略）教化善缘。六度弟子归我化城，免在阎浮受其苦难，悉得安稳，衣食自然，长受极乐。天魔外道弱水隔之，不来为害。吾当度六种之人，第一度者孝顺父母，敬重三宝。’”（第1463页中、下）
- 3 《宋高僧传》卷21《契此传》：“释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臃臃，蹙頞皤腹，言语无恒，寝卧随处。常以杖荷布袋入鄞肆，见物则乞，至于醢酱鱼菹，才接入口，分少许入囊，号为长汀子布袋师也。曾于雪中卧而身上无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又于大桥上立，或问‘和尚在此何为？’曰‘我在此觅人’。常就人乞啜，其店则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现相表兆。亢阳，即曳高齿木屐，市桥上竖膝而眠；水潦，则系湿草屨。人以此验知。以天复中（902～904年）终于奉川，乡邑共埋之。后有他州见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祥雍点校本，第553页。

处在门神外侧，作为神僧吸收到佛教队伍中来。前述安塞石寺河第3窟前壁两明窗下一对布袋和尚〔图三五〕，画面相对较大，但处在次要位置，没有参与石窟主体图像构成，地位也不如前壁门两侧的一对菩萨（观音？）。前述富县石泓寺第2窟见有三尊布袋和尚，分别处在右壁后端下部、左前柱右侧面中部、第1窟左壁（即第2窟自然延伸部分），三者相对周围其他图像画面偏小，而且不构成组合关系。以上三窟实例应作为民间圣者信仰表现，似乎还不具备未来弥勒佛的内涵。志丹城台北宋大观二年（1108）——金贞元三年（1155）石窟前廊左右壁上部前侧一对布袋和尚，分别与七佛（一者尚存肉髻）、涅槃图像组合〔图三六〕，雕刻时间应与贞元三年（1155）造涅槃像同时。与七佛组合表明布袋已处在过去、现在、未来佛谱系之中，与涅槃组合意味着布袋具有传法功能，等同于未来弥勒佛。以上可知，宋金之际布袋和尚开始出现在陕北石窟，一部分作为民间圣者信仰表现，另一部分已具有弥勒佛功能。然而，这些石窟的布袋和尚多处在次要位置，更强调了民间圣者信仰的根本。

9. 三教像

三教像即释迦佛、老君、孔子组合。两宋时期以理学为骨干，多种思想融合发展，尤其得力于统治者倡导儒释道一致思想¹。从北宋晚期徽宗朝有关诏书可知²，此前寺院中多设三教之像，并且以释迦佛为中尊，老君、孔子配置左右，特崇佛教之意昭然。尊崇道教的徽宗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终究伴随着北宋灭亡而不得推广。合水莲花寺北宋绍圣二年（1095）摩崖三教龕像〔图三七〕³，释迦居中结跏趺坐，左右配置倚坐的老君、孔子，而且中间者高于两侧者。该像雕刻于徽宗诏书发布稍前，表现内容与诏书描述何其相似。类似表现还见于大足石篆山北



图三五 安塞石寺北宋宣和元年五年（1119-1123）第3窟前壁布袋和尚



图三六 志丹城台北宋大观二年（1108）至金贞元三年（1155）石窟前廊右壁（陈怡安摄）



图三七 合水莲花寺北宋绍圣二年（1095）摩崖三教龕像

1 《佛祖统纪》卷43《法运通塞志》：“淳化元年（990），诏参政苏易简撰《三教圣贤录》。乞通慧赞宁、太一宫道士韩德纯分领其事。”（第400页中）又，同书卷44《法运通塞志》：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一月，舍利见于玉清昭庆宫圣祖明庆殿，或以为道门无舍利事。上谓宰臣王旦曰，‘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唯识达之士能一贯之，滞情偏执于道益远。’”（第405页上）

2 《佛祖统纪》卷46《法运通塞志》：崇宁“五年（1106）十月，诏曰，‘有天下者尊上帝敢有弗虔，而释氏之教，乃以天帝置于鬼神之列，淡神逾分，莫此之甚，有司其除削之。’又勅，‘水陆道场内设三清等位，元丰降诏止绝，务在检举施行。旧来僧居多设三教像，遂为院额殿名。释迦居中，老君居左，孔圣居右，非所以奉天真与儒教之意，可迎其像归道观学舍以正其名。’”（第419页上）

3 题记：“庆州合水县王……惠家庄弟子惠文发心，于绍圣二年（1095）□月拾日癸亥岁，自□心向面前石岳（岩）内□□造石素五伯（佰）罗汉毕、三教诸佛毕终。”



图三八 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2窟后壁“三佛”与十六罗汉

宋晚期摩崖龕像、大足妙高山南宋早期2号窟造像¹。

以上9种图像除十二圆觉菩萨、千手观音、地藏十王，有时配置在相对重要部位以外，多配置在比较次要位置，而且地藏十王之外者出现频率较低，表述思想从属于主体图像。这些图像多是先前其他地方流行过的种类，难以构成区域性特征。

四 图像组合

基于陕北宋、金石窟各种主流图像的组合关系，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佛”与十六罗汉或文殊普贤组合、“三佛”与涅槃及五百罗汉组合、“三佛”与千佛或万菩萨组合、释迦佛与十六罗汉或文殊普贤组合、主尊与次主尊水月观音组合、显教图像与密教图像组合、其他组合等七种形式。各种类型图像组合表述思想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彼此之间的佛教内涵又比较接近，体现了共通的地域和时代特征。

1. “三佛”与十六罗汉或文殊普贤组合

“三佛”与十六罗汉或文殊普贤（或二者兼有）组合，为陕北宋、金石窟重要图像构成形式之一，占列举实例的近1/4。载体概为中小型后壁佛坛窟。具体分作两种组合情况。

(1) “三佛”与十六罗汉

“三佛”与十六罗汉组合，可以视为释迦佛与十六罗汉组合的移植形式。十六罗汉与“三佛”之中尊释迦佛呼应，内涵继释迦佛之后护法、传法的用意。然而，“三佛”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要义在于从秽土进入净土，十六罗汉恰好为秽土与净土之间的救世主，而且自身具有趋向理想世界意涵。大概基于罗汉的这两种功能，使得十六罗汉与“三佛”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组合的逻辑思维，或可解释为释迦佛教化的娑婆世界众生，经由罗汉住世的趋向理想世界阶段，将来往生净土世界。

实例见于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2窟〔实例2、图三八〕、横山鸿门寺北宋晚期石窟（实例10）、富县石坊头北宋晚期石窟（实例8）。其中，实例2还表现了代表菩萨行的文殊与普贤，善财童子参访文殊、普贤、水月观自在，以及文殊化现老人场面，反映了华严经菩萨行思想和五台山信仰。实例8表现涅槃像与十六罗汉呼应，依然强调了传承佛法的重要性。

(2) “三佛”与文殊普贤

1 大足石篆山摩崖龕像，为北宋晚期施主严逊买地开凿，岳阳文惟简等雕刻。参见胡良学、陈静《大足石篆山、妙高山摩崖造像的调查研究》，《四川文物》1998年第1、2期。其中6号龕孔子及弟子十哲像北宋元祐三年（1088）雕刻，7号龕三身佛像（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佛）北宋元丰五年（1082）雕刻，8号龕老君及真人像北宋元丰六年（1083）雕刻，依据先中间后左、右，亦即7号、8号、6号的次序雕刻。此三龕像由西而东平行排列，规模仿佛，形式接近，笔者以为这是作为一组造像设计的，形成以佛教为中心，左右侧配列道教、儒教造像的格局。大足妙高山南宋早期第2窟，后壁与左右侧壁分别雕刻结跏趺坐释迦佛、倚坐老君、倚坐孔子，与合水莲花寺北宋绍圣二年（1095）摩崖三教龕像相仿。

“三佛”与文殊普贤组合，或可解释为娑婆世界众生，以文殊、普贤为典范修菩萨行，以期将来往生净土世界。实例见于安塞毛庄科北宋晚期第1窟（实例4）、安塞毛庄科北宋晚期第2窟（实例5）、安塞洞湾北宋晚期大窟（实例6）、安塞新茂台北宋晚期石窟（实例7）。其中，实例7表现五百罗汉应具有趋向理想世界内涵，地藏十王则反映了民众祈求免除地狱之苦的愿望。

2. “三佛”与涅槃及五百罗汉组合

“三佛”与涅槃及五百罗汉组合，为陕北宋、金石窟又一重要图像构成形式，占列举实例的1/4。大中型窟居绝大多数，个别为小型窟。石窟结构多为设支柱佛坛窟、中心佛坛窟，也见有设屏壁佛坛窟、前廊后室窟、方形窟。

包括前述安塞樊庄第2窟（实例21）、黄陵万佛寺石窟（实例18）、富县阁子头第1窟（实例24）、富县马渠寺第2窟（实例16）、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4窟（实例25）、子长钟山北宋晚期第4窟（实例3）、富县石佛堂北宋晚期第5窟（实例15）、合水安定寺齐阜昌二年（1132）至金大定十八年（1178）石窟（实例32）8个石窟。其中实例18、实例24、实例32以“三佛”为主尊，实例3为变通“三佛”组合，实例25推测主尊为释迦佛，与后壁弥勒佛、阿弥陀佛亦构成“三佛”组合，其他实例佛坛造像已不存，当初主尊为“三佛”的可能性较大。“三佛”的意义在于娑婆世界众生将来往生净土世界，构成此类石窟的主题。

如前所述，在涅槃图像中不仅金棺说法，并且半数入涅槃场面表现摩耶夫人，说明其重心在于表述孝道思想。五百罗汉的主要功能为传承佛法，况且二实例表现了罗汉托钵场面，与涅槃组合表现的五百罗汉传承释迦佛教法为其根本意图。五百罗汉与“三佛”间接组合，似乎还具有象征趋向理想世界的用意。倡导孝道思想、传承佛法构成此类石窟的次主题。

其中，实例21两侧壁中央配置文殊、普贤一对图像，以表述菩萨行思想，后壁与前壁分别表现地藏十王、水月观自在，用来表述地狱救济和现世救济思想，成为该窟室的辅助内容。实例18前壁中央千手观音、甬道日月光菩萨，突出了消灾祈福思想，两侧壁授记图像则反映了因果报应和授记成佛思想，亦成为该窟室的辅助内容。实例25左壁前上部祥云之中现佛手相〔图三九〕，表现了五台山清凉寺武周长安年间发生的传说故事¹，与前述文殊化现老人故事一样，反映了五台山信仰。

3. “三佛”与千佛或万菩萨组合

“三佛”与千佛或万菩萨组合，为陕北宋、金石窟比较流行的图像构成形式，占列举实例的近1/6。具体分作两种组合情况。



图三九 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4窟左壁云中佛手现

1 《广清凉传》卷1《五台境界寺名圣迹》：“清凉寺，依山立名，托居岩侧，前通涧壑，上接云霓。长安二年（702）五月十五日，建安王仕并州长史，奏重修葺。敕大德感法师亲谒五台山，以七月二十日登台之顶。僧俗一千余人同见五色云中现佛手相。白狐白鹿驯狎于前，梵响随风流亮山谷，异香芬馥远近袭人。又见大僧身紫金色面前而立，复见菩萨身带璎珞西峰出现。法师乃图画闻奏，帝大悦，遂封法师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请充清禅寺主，掌京国僧尼事。”（第1107页上、中）



图四〇 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天井题记

(1) “三佛”与千佛组合

前述安塞招安第3窟（实例22）以“三佛”为主尊，富县柳园石窟（实例1）以“三佛”为次主尊，志丹何家瓜石窟（实例29）主尊不明，但组合见有“三佛”中二要素。三石窟规格大小不一，结构多样，壁面布满千佛。千佛图像推测具有使礼拜供养者灭罪得福、往生净土作用，部分功能与“三佛”

重合。此三石窟均表现十六罗汉、水月观自在，前者应具有传承佛法、象征趋向理想世界双重内涵，后者反映人们寻求现世救济的心里。前二实例还表现文殊、普贤以表述菩萨行思想。实例1以金刚界大日如来为主尊，则突出了成就法身思想。

(2) “三佛”与万菩萨组合

包括前述子长钟山第3窟（实例20）、延安清凉山第1窟（实例17），二者分别为超大型的设支柱佛坛窟、设屏壁佛坛窟。前者以“三佛”为主尊，后者从佛坛和天井结构推测，当初主尊亦应为“三佛”造像。此二石窟的四壁、支柱、屏壁上布满小菩萨像，成为仅次于“三佛”的内容。菩萨职能在于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亦即自利利他，在小菩萨群像的重要部位往往表现水月观自在，从这种小组合来看，菩萨救济众生或满足众生种种需求的利他职能尤其受到重视。

实例20整窟图像基本一次性设计并完成，图像严整有序。该窟除“三佛”、万菩萨两种主要图像之外，佛坛与支柱前面成对表现的文殊、普贤，大量对称配置的水月观自在，还有地藏、观音对称表现，以及多幅地藏十王，既有上求菩提内涵，又涉及救济众生的各个方面，从中隐约可见华严经思想在发挥作用。该窟中心佛坛右尊弥勒佛上方天井墨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图四〇〕，题记横匾的装饰风格与同窟另二天井一致，应为原初设计，似乎有意昭示菩萨行内涵，十分契合该石窟图像的组织思想。再者，前壁中门上方金刚界五佛应是成就法身的象征，前壁腰部十六罗汉代表传承佛法，左侧壁药师佛则用来消灾祈福，形成辅助性表现。实例17佛坛造像（不存）及万菩萨以外图像比较凌乱，缺乏对称性，许多图像属于二次性设计所为，难以说明原初设计的详细指导思想。

4. 释迦佛与十六罗汉或文殊普贤组合

释迦佛与十六罗汉或文殊普贤组合，也是陕北宋、金石窟比较流行的图像构成形式，占列举实例的近1/6。具体分作两种组合情况。

(1) 释迦佛与十六罗汉

这种组合继承了五代时期造像传统¹，以传承佛法为宗旨。实例有富县大佛寺北宋开宝六年（973）第3窟（实例13）、佳县云岩寺第3窟（实例31），原初佛坛造像已不存，由造像记可知二者主尊为释迦佛。富县马渠寺第3窟（实例12）佛坛面积较小，推测原初可能放置释迦佛。三者分别为小型中心佛坛窟、大型前廊后室窟、

1 譬如《宋高僧传》卷28《僧伽传》：“释智江，（中略）后唐同光元年（923），在微子之墟住院，缔构堂宇，轮奐可观。复塑慈氏释迦二尊、十六罗汉像，咸加缋彩，克肖圣仪，善务方办。”范祥雍点校本，第702、703页。

小型后壁佛坛窟。这些表现十六罗汉石窟以释迦佛为主尊，在突出释迦佛教化的同时，强调了十六罗汉传承佛法的重要性。其中，实例 31 为前廊后室窟，后室释迦佛、十六罗汉之外，还有文殊与普贤，传承佛法、菩萨行思想共同构成该窟主题，前廊表现用于现世救济与地狱救济的观音、地藏，反映了人们希求解除各种苦难的心里，神僧布袋和尚则体现了人们神僧信仰意趣。

(2) 降魔成道释迦佛与文殊普贤组合

包括富县石泓寺第 2 窟〔实例 28、图四一〕、志丹卢家沟宋金之际石窟〔实例 11、图四二〕，二者分别为超大型设支柱佛坛窟、小型后壁佛坛窟。通常，降魔成道代表释迦征服自我，获得最高觉悟或达成法身的过程，那么，降魔成道释迦佛与文殊普贤组合，就意味着由菩萨行而成就法身。但是，陕北石窟中降魔成道内涵另有深意，实例 28 与主尊释迦佛对应的窟顶部题记：“我佛当殿住三界，镇得魔军心胆碎，众多善友结良缘，过世便是龙华会。”表明其魔应指大环境中戕害生民之魔，削除战乱、百姓安居乐业才是本石窟降魔成道像的真正含义。该窟主体图像大致对称布局，属于一次性设计并完成。左右侧壁后部，分别表现以弥勒佛、释迦佛为中心的三尊像〔图四三、图四四〕，释迦佛左侧又表现阿弥陀佛，表述了由娑婆世界过渡到净土世界的思路。后壁右上部弥勒菩萨似乎与左壁后部弥勒佛存在呼应关系，亦即人们对弥勒下生成佛的期待。石窟四壁、支柱壁面布列菩萨群像，其间多处表现水月观自在，又在后壁左下部表现地藏菩萨、支柱上部表现日月光菩萨、右壁前部表现观音救八难，这些图像着重表述了菩萨救济众生的思想。实例 11 缺乏辅助图像，该窟以降魔成道释迦佛为主尊，或许同样出于保佑众生平安之目的。

5. 主尊与次主尊水月观音组合

包括前述黄龙月坪石窟（实例 14）、宜川贺家沟石窟〔实例 9、图四五〕、安塞石寺河第 3 窟（实例 19），前二者为小型窟，后者为大型窟，都处在远离交通干线的偏僻



图四一 富县石泓寺金皇统元年（1141）至贞元二年（1154）第 2 窟 佛坛造像



图四二 志丹卢家沟宋金之际石窟 佛坛造像（陈怡安摄）



图四三 富县石泓寺金皇统元年（1141）至贞元二年（1154）第 2 窟左壁 三尊像（林保尧摄）



图四四 富县石泓寺金皇统元年(1141)至贞元二年(1154)第2窟右壁三尊像(林保尧摄)



图四五 宜川贺家沟北宋崇宁二年三年(1103、1104)石窟后壁



图四六 志丹城台北宋大观二年(1108)至金贞元三年(1155)石窟佛坛与后壁(陈怡安摄)

地方。这些石窟佛坛主尊造像均已不存,一概在后壁中央表现大画面水月观自在,形成所在石窟的次主尊,突出了现世救济思想。三者均见有文殊普贤、十六罗汉,沿袭了陕北石窟习惯性表现。前二者尚有弥勒佛、阿弥陀佛,反映了施主祈求往生净土世界的心里。后者见有僧伽和尚、布袋和尚,是为神僧信仰的产物。此外,前二者在石窟前壁表现施主像,又结合造像记可知此二石窟具有家窟性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礼拜供养场所。

6. 显教图像与密教图像组合

在陕北宋、金石窟图像构成中,三个石窟的密教图像占有重要分量。其一,前述富县柳园石窟(实例1),主尊表现金刚界大日如来,与次主尊“三佛”及十六罗汉、文殊普贤等共存。其二,安塞沐浴北宋晚期石窟(实例26),佛坛主尊为“三佛”。两侧壁对称表现金刚界大日如来、胎藏界大日如来,二者与文殊、普贤形成小组合,表述由菩萨行成就法身的思想。其三,志丹城台石窟[实例30、图四六],后室佛坛主尊造像不存,后壁表现华严经三身佛,其中尊同时为金刚界大日如来,此三身佛与两侧壁前部文殊、普贤呼应,同样表述由菩萨行成就法身思想。两侧壁中部一对阿弥陀佛及后部一对水月观自在,表述施主祈求往生净土与现世救济心里。前壁上部一列七佛(仅存一尊),七佛关联经典为数甚多,诸经典七佛名号非一,大小乘经典叙述受持七佛名号所得利益各有不同,依据玄奘译《受持七佛名号所生功德经》,受持七佛名号可以消除种种烦恼,直至成佛。该窟前廊表现十方佛、十六罗汉,推测主要表述灭罪得福、传承佛法的意图。以上可见,在这些石窟中表述成就法身思想的密教大日如来,与往生净土、菩萨救济、灭罪得福、传承佛法等显教图像并列,大体形成两条思想脉络。

7. 其他组合

安塞黑泉驿北宋晚期石窟(实例27),后壁佛坛造像已消失,左右壁高浮雕十二圆觉菩萨,这是已知陕北宋、金石窟中唯一一座以心地修行为主导的石窟。该窟前壁高浮雕十六罗汉,与十二圆觉菩萨不存在教义上的关联。

甘泉孟家峁石宫寺北宋晚期第5窟(实例23),佛坛表现主尊“三佛”,后壁与左右侧壁中央各自表现一

道教人物¹。再者，前述富县柳园石窟中心柱前面大日如来像龕的下方，所见长须者（头部残缺）应该也是道教人物。这是陕北宋、金石窟中少有的掺入道教因素者，其道教图像在所处石窟图像构成中从属于佛教图像。

此外，实例 1、2、7、9、21、25、29、31，在石窟入口处或左右侧壁前端表现一对门神，实即所在石窟的守护神，使得所在石窟形成完整的佛教教化和礼拜供养的道场。

综上所述，在陕北宋、金石窟图像组合中，“三佛”（娑婆世界→净土世界）、释迦佛（教主）、大日如来（成就法身）、文殊普贤（菩萨行）、十六罗汉（传承佛法、象征趋向理想世界）、涅槃与五百罗汉（倡导孝行、传承佛法）、水月观自在（现世救济）、千佛与万菩萨（灭罪得福、下化众生）8种主流图像，发挥主导作用。通常，以“三佛”或释迦佛为主尊，附加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其他图像，构成各个石窟的主体图像。在诸石窟图像组合之中，“三佛”、文殊普贤、十六罗汉、涅槃与五百罗汉、水月观自在5种高频率出现，形成习惯性表现，所反映的往生净土、传承佛法、菩萨行、倡导孝行、现世救济思想，构成陕北宋、金石窟的实质内涵。尽管存在各种类型的图像组合，表述思想侧重点亦有所不同，但主要因素大体不出上述8种图像，彼此之间多有重合部分，其图像构成呈现比较接近的佛教内涵。非主流图像中的千手观音（消灾祈福）、日月光菩萨（消灾祈福）、地藏十王（地狱救济）、僧伽和尚（神僧信仰）、布袋和尚（神僧信仰）等，在石窟图像构成中具有增补并加强主体图像的作用。各种不同功能的图像，采用叠加方式组织在同一石窟之中，同时表述多种佛教思想，成为陕北宋、金石窟的根本特征。而且北宋与金代石窟的结构、图像组合呈现自然、平稳过渡状态，没有因为朝代更迭而改变发展方向。

陕北宋、金石窟所见主流和非主流图像，绝大多数自唐、五代延续而来，尤其晚唐、五代出现的一些图像，诸如十六罗汉、五百罗汉、水月观自在、地藏十王等，入宋以后获得巨大发展，肇始于晚唐、五代的僧伽和尚、布袋和尚二神僧图像，也受到人们青睐。这些兴起于晚唐、五代时期佛教图像的着眼点，并非代表佛教义理的佛陀，而是凸显神通变化的罗汉、神僧，其中蕴含的不可思议力量成为人们关注重心，罗汉传承佛法与象征趋向理想世界内涵，以及神僧附着的佛、菩萨职能亦同时彰显。水月观自在不仅体现现世救济职能，其中潜藏的华严境界和禅宗思想也是时代的需求，地藏、十王则将地狱救济与果报轮回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千手观音、日月光菩萨、摩利支菩萨等表述的消灾祈福思想，恰成为战乱之中陕北民众的心里依托。涅槃图像所以频繁出现，与理学兴起背景中倡导孝行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由此可见，陕北宋、金石窟佛教图像，汇聚了传统的、地域的和时代的多种思想观念，难以用一种或几种特定的经典理论加以限定，迥然有别于初盛唐时期注重表述净土思想和佛教义理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文殊普贤、水月观自在、万菩萨、兼有毗卢遮那佛尊格的大日如来4种图像，均与华严经义理关联，凸显以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为宗旨的菩萨行思想，亦成为陕北佛教信众的心里需求。然而，所反映的华严经思想已经化整为零，既不系统亦非完备，而且这些图像内容已超出此经框架，内涵更加宽泛，我们只能隐约地感受到华严经思想的存在和作用。华严经思想与净土信仰、罗汉信仰、五台山信仰的结合，使得佛教中国化、民俗化进一步加深，这个过程就存在于陕北宋、金石窟之中。（附记：未注明出处图片为笔者实地拍摄）

¹ 现已不存。参见张砚、李安福《陕西省甘泉县佛、道石窟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4期。

附表1-1 陕北宋、金石窟—中心柱窟图像

实例	石窟名称	方向/尺寸(cm) 面阔×进深×通高	中心柱	后壁	左壁	右壁	前壁
1	富县柳园北宋庆历三年(1043)石窟	坐西北面东南 417×282×222	前面大日如来, 天尊; 后面地藏与十王; 左面 水月观自在; 右面水月 观自在, 禅宗六代祖师	“三佛”(释迦、弥勒、阿弥 陀), 十六罗汉, 骑狮文殊、 乘象普贤, 观自在救八难	千佛; 弥勒佛	千佛; 阿弥陀佛	千佛, 门神

附表1-2 陕北宋、金石窟—方形窟图像

实例	石窟名称	方向/尺寸(cm) 面阔×进深×通高	后壁	左壁	右壁	前壁
2	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2窟	坐东北面西南 550×400×460	“三佛”(释迦、弥勒、 阿弥陀), 罗汉八身	骑狮文殊(含善财童 子), 水月观自在(含善 财童子), 罗汉四身, 门神	乘象普贤(含善财童子), 水月观自在(含善财童子), 罗汉四身, 文殊化现老人, 门神	
3	子长钟山北宋晚期第4窟	坐北面南 370×350×320	释迦佛(兼临终说 法)、入涅槃、金棺 说法, 五百罗汉	弥勒佛, 骑狮文殊, 五百罗汉、文殊化现老人	阿弥陀佛, 水月观自在, 五百罗汉	五百 罗汉

附表1-3 陕北宋、金石窟—后壁佛坛窟图像

实例	石窟名称	方向/尺寸(cm) 面阔×进深×通高	后壁佛坛	左壁	右壁	前壁
4	安塞毛庄科北宋晚期第1窟	坐北面南 147×155×153	“三佛” (释迦、弥勒、阿弥陀)	骑狮文殊	乘象普贤	
5	安塞毛庄科北宋晚期第2窟	坐北面南 260×375×205	“三佛” (释迦、弥勒、阿弥陀)	骑狮文殊	乘象普贤	
6	安塞洞湾北宋晚期大窟	坐西面东 503×514×260	“三佛” (释迦、弥勒、阿弥陀)	骑狮文殊	乘象普贤	
7	安塞新茂台北宋晚期石窟	坐东南面西北 290×196×230	“三佛” (释迦、弥勒、阿弥陀)	骑狮文殊, 五百 罗汉, 地藏, 冥 府五王, 门神	乘象普贤, 五百罗汉, 地藏, 冥府 五王, 门神	
8	富县石坊头北宋晚期石窟		“三佛” (释迦、弥勒、阿弥陀)	罗汉八身	入涅槃, 罗汉八身	
9	宜川贺家沟北宋崇宁二 年、三年(1103、1104)石窟	坐北面南 268×291×222	佛坛造像缺失。后壁浮 雕水月观自在(含唐僧取 经), 文殊、普贤	弥勒佛, 罗汉八 身, 弥勒菩萨, 天藏菩萨, 冥府 五王	阿弥陀佛, 罗汉八身, 地藏菩萨, 冥府五王	释迦佛, 阿 弥陀佛, 施 主像, 门神
10	横山鸿门寺北宋晚期石窟	坐东北面西南 447×365	“三佛” (释迦、弥勒、阿弥陀)	罗汉八身	尊像缺失	
11	志丹卢家沟宋金之际石窟	坐南面北 343×370×275	释迦佛, 骑狮文殊、乘象 普贤			
12	富县马渠寺齐阜昌 五年(1135)第3窟	坐北面南 195×183×187	造像缺失	罗汉八身	罗汉八身	

附表1-4 陕北宋、金石窟—中心佛坛窟图像

实例	石窟名称	方向/尺寸(cm) 面阔×进深×通高	中心佛坛	后壁	左壁	右壁	前壁
13	富县大佛寺北宋开宝六年(973)第3窟	坐东面西 305×250×205	释迦佛、二弟 子、二菩萨		罗汉八身	罗汉八身	
14	黄龙月坪北宋绍圣二年(1095)石窟	坐南面北 275×350×208	造像缺失	水月观自 在, 阿弥陀 佛, 弥勒佛	菩萨(普贤?), 罗汉七身	骑狮文殊, 罗汉八身	施主像

(续附表1-4)

15	富县石佛堂北宋晚期第5窟	坐西面东 510×475×334	造像缺失	临终说法; 五百罗汉	入涅槃(摩耶 夫人出现), 五百罗汉	金棺说法, 五百罗汉	
16	富县马渠寺北宋崇宁五年(1106)第2窟	坐北面南 517×512×339	三尊像已缺失	临终说法, 五百罗汉	金棺说法, 五百罗汉, 水月观自在	入涅槃(摩耶 夫人出现), 五百罗汉	五百 罗汉

附表1-5 陕北宋、金石窟—设屏壁佛坛窟图像

实例	石窟名称	方向/尺寸(cm) 面阔×进深×通高	佛坛	后壁	左壁	右壁	前壁
17	延安清凉山熙宁九年(1076)至元祐元年(1086)第1窟	坐东北面西南 1770×1300×670	三尊像已缺失	万菩萨, 水月观自在	万菩萨, 十一面观自在, 水月观自在, “三佛”(释迦、弥勒、阿弥陀)	万菩萨	万菩萨, 水月观自在, 阿弥陀佛
18	黄陵万佛寺北宋绍圣二年(1095)至政和五年(1115)石窟	坐西面东 918×845×516	“三佛”(释迦、弥勒、阿弥陀)	临终说法, 入涅槃(摩耶夫人出现), 金棺说法, 五百罗汉	阿育王施土因缘, 立佛一身	罗睺罗受记因缘, 立佛三身	千手观音, 水月观自在, 西方三圣, 文殊、普贤, 十菩萨
19	安塞石寺河北宋宣和元年至五年(1119~1123)第3窟	坐西南面东北 748×742×321	三尊像已缺失	水月观自在, 僧伽和尚, 千佛, 罗汉六身	千佛, 普贤, 罗汉六身(缺3身)	千佛; 文殊; 罗汉六身(缺2身)	双菩萨, 双布袋和尚

附表1-6 陕北宋、金石窟—设支柱佛坛窟图像

实例	石窟名称	方向/尺寸(cm) 面阔×进深×通高	佛坛	后壁	左壁	右壁	前壁
20	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	坐北面南 1643×978×560	中心佛坛“三佛”(释迦、弥勒、阿弥陀), 骑狮文殊、乘象普贤	万菩萨, 华严三圣等	万菩萨, 水月观自在, 药师佛等	万菩萨, 水月观自在等	万菩萨, 金刚界五佛, 水月观自在, 地藏与十王, 观自在(含善财、龙女), 十六罗汉
21	安塞樊庄北宋元祐八年(1093)至政和三年(1113)第2窟	坐北面南 680×680×300	中心佛坛三尊像已缺失, 文殊、普贤	临终说法, 地藏与十王, 五百罗汉	入涅槃, 金棺说法, 骑狮文殊, 五百罗汉	起塔供养, 乘象普贤, 五百罗汉	水月观自在, 五百罗汉, 门神
22	安塞招安北宋元祐九年(1094)至崇宁元年(1102)第3窟	坐北面南? 950×900×380	中心佛坛“三佛”(释迦、弥勒、阿弥陀)	千佛, 罗汉八身	千佛, 骑狮文殊, 水月观自在, 罗汉二身	千佛, 普贤, 水月观自在(唐僧取经), 罗汉六身	千佛, 观自在救八难
23	甘泉孟家瓜石官寺北宋晚期第5窟	坐北面南 588×618×390	中心佛坛“三佛”(释迦、弥勒、阿弥陀)、文殊、普贤	六佛, 老子?	二佛, 老子, 水月观自在	二佛, 天尊, 菩萨	立佛
24	富县阁子头北宋元符三年(1100)至政和二年(1112)第1窟	坐南面北? 520×434×207	后壁佛坛“三佛”(释迦、弥勒、阿弥陀)		入涅槃, 五百罗汉	金棺说法, 五百罗汉	
25	延安清凉山北宋晚期第4窟	坐东北面西南 693×546×337	不存	五百罗汉, 阿弥陀佛, 弥勒佛	入涅槃, 五百罗汉, 佛手云中现, 门神	临终说法, 五百罗汉, 太子游门, 门神	水月观自在, 金刚界大日如来
26	安塞沐浴北宋晚期石窟	坐南面北 512×402×274	中心佛坛三尊像缺失	五百罗汉	五百罗汉, 胎藏界大日如来, 骑狮文殊	五百罗汉, 金刚界大日如来, 乘象普贤	五百罗汉、十方佛
27	安塞黑泉驿北宋晚期石窟	坐南面北 860×530×420	后壁佛坛造像缺失		圆觉菩萨六身	圆觉菩萨六身	十六罗汉

(续附表1-6)

28	富县石泓寺金皇统元年(1141)至贞元二年(1154)第2窟	坐东北面西南 1030×1070×540	中心佛坛释迦佛,文殊、普贤	万菩萨,地藏菩萨,水月观自在,僧伽和尚,阿弥陀佛,“三佛”(释迦、弥勒、阿弥陀)	万菩萨,弥勒佛,大日如来,水月观自在	万菩萨,释迦佛,阿弥陀佛,普贤,观音救难	万菩萨,观自在
----	--------------------------------	-------------------------	---------------	--	--------------------	----------------------	---------

附表1-7 陕北宋、金石窟—前廊后室佛坛窟图像

实例	石窟名称	方向/尺寸(cm) 面阔×进深×通高	后室					前廊		
			佛坛	后壁	左壁	右壁	前壁	后壁	左壁	右壁
29	志丹何家坬北宋绍圣二年(1095)石窟	坐东面西 前廊406×121 后室465×384×317	损坏不明	千佛	千佛; 弥勒佛	千佛; 阿弥陀佛	水月观自在,弥勒菩萨,十六罗汉,达摩	门神	门神	门神
30	志丹城台北宋大观二年(1108)至金贞元三年(1155)石窟	坐东北面西南 前廊2532×621×430 后室977×655×480	三尊像(不明)	大日如来等“三佛”	阿弥陀佛,观自在,文殊	阿弥陀佛,观自在,普贤	七佛	十方佛,罗汉八身	罗汉四身,布袋和尚,七佛	罗汉四身,涅槃,布袋和尚,菩萨群像
31	佳县云岩寺北宋政和四年(1114)第3窟	坐西北面东南 前廊730×140×310 后室380×340×290	后壁佛坛释迦佛		罗汉六身,乘象普贤	罗汉六身,骑狮文殊	罗汉四身	布袋和尚,门神	地藏菩萨	水月观自在
32	合水安定寺齐阜昌二年(1132)至金大定十八年(1178)石窟	坐西南面东北,前廊698×305×278,后室379×477×278	中心佛坛“三佛”(尚存释迦、弥勒)	入涅槃,五百罗汉	坐佛五身,菩萨四身,五百罗汉	坐佛五身,菩萨四身,五百罗汉		五百罗汉(降龙、伏虎罗汉)	五百罗汉	五百罗汉

附表2 陕北宋、金石窟地藏菩萨像一览

实例所在	姿态	装束	持物	组合图像
富县柳园北宋庆历三年(1043)石窟中心柱后面	半跏趺坐	披帽	锡杖	十王
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后壁右端	结跏趺坐	戴冠	宝珠、锡杖	十王、闵公、道明
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前壁左端	半跏趺坐	戴冠	宝珠、锡杖	十王、闵公、道明
子长钟山北宋治平四年(1067)第3窟前壁中门左侧	结跏趺坐	戴冠	宝珠	狮子、水月观自在
延安清凉山熙宁九年(1076)至元祐元年(1086)第1窟左屏壁外面	倚坐	不明	宝珠、锡杖	道明、狮子
安塞樊庄北宋元祐八年(1093)至政和三年(1113)第2窟后壁中央	半跏趺坐	披帽	宝珠	十王、闵公、道明、狮子
宜川贺家沟北宋崇宁二年、三年(1103、1104)石窟右壁	半跏趺坐	不明	不明	十王、地狱
佳县云岩寺山北宋政和四年(1114)第3窟前廊左壁	站立	披帽	锡杖	水月观自在
安塞新茂台北宋晚期石窟左右两壁后端	半跏趺坐	披帽	宝珠、锡杖	十王、闵公、道明
富县石泓寺金皇统元年(1141)至贞元二年(1154)第2窟后壁左端	倚坐	披帽	锡杖	道明、狮子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

(责任编辑: 徐婉玲)